TIAN JIN SHI ZHI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目 录

特 载

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谈领导干部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 高京斋（3）

2021年天津市地方志工作要点 …… （9）

关于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报告 …… 吴爱民（12）

学习吴志宏 建功新时代

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学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情况 …… （16）

建党百年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研究方向 …… 王 进（18）

从津门红色遗址中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力量 …… 王 炜（24）

志鉴交流

浅释《天津抗日战争志》的记述时限问题 …… 王中玮（30）

关于打造区级“精品年鉴”的几点思考 …… 王宗征（34）

史学百家

三条石——中国手工作坊迈向近代工业的缩影 …… 史宇飞 (36)

杨轶伦与泠枫诗社 …… 侯福志 (42)

三津人物

涂宗涛先生学术谈片 …… 宋文彬 (45)

志述津沽

浅析《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 谢连华 (49)

“安福财神”王郅隆其人其事 …… 王庆普 (54)

顽强斗争的盘山民兵班 …… 王玉梅 (59)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 (61)

区级动态 …… (63)

天津市贯彻落实 2021 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二)

《天津抗日战争志》编修工作推动会召开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三)

2021 年第 2 期(总第 193 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梁　娜
张月光　白文平
邹积浩　岳　宏
李　娜　沙　洵
宋铭月　王中玮
韦　恬　刘　新
郭天天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 号增 1 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刊型 2020026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500 册

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

——谈领导干部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高京斋

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重视修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读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领导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要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深入思考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体现在读志、用志、修志三个方面。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他就常常身边不离“志”。

喜欢读志

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深很透。他对编写《正定古今》的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

1985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厦门市副市长时，通过同学向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并与其进行过深入交流。

1988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到宁德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让随行的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找一本福宁府志。陈增光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霞浦，习近平同志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90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

2002 年，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浙江各地考察，了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

2007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月内，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供他阅读使用。

善于用志

1989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古田县调研。晚饭后，他让县委书记蔡天初找一本《古田县志》。第二天早上，习近平同志对蔡天初说，“古田县志有 3 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这说明习近平同志看志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细致。他还告诫蔡天初，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

2006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期间，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重视修志

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

2004 年 10 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白沙村考察。在村会计毛兆丰的书房里看到了 1991 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就拿起来翻阅。习近平同志鼓励村民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2012 年 7 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考察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等机构力量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充分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对地方志价值作用最精辟的评价和概括。不管是自我修养、为人处世，还是组织管理、治国理政，“做一个明白人”最重要。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

中国修志已有数千年历史，官方修志传统流传至今。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唐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每个州、府、县都定期编纂方志，作为国史的辅助和补充。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朝政府谕令全国各地府、县、卫、所皆必修志，同时颁布《修志凡例》十七则，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县志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设立一统志馆，先后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历时150年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方志编修，新方志事业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相继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1.1万余部，整理旧志文献3千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千多种，建成国家方志馆，形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常编常新。悠悠千载的传承积淀，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多达8000余种、10多万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还多。至2020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地方志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的基因密码，也是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重要载体。

地方志是治国理政的必备法宝

“志者，志一方之事也……悉诚为政者之一事也”。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地方志旨在“述往事、思来者”以达到“彰往而察来”的功效。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去做刺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州志是“诚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也。”

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以及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略的参考。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应用地方志。1929年，红军解放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2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1960年10月在湖北考察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要修地方志。他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毛泽东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5月，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国办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首次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2016年3月，“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要求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2020年12月，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地方志是鉴古知今的地情教科书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地情教科书，受到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不

仅是加强个人修养、提升道德水准、提高执政能力的铺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风、教化育人、弘扬正气的助推器。《周易》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东汉荀悦说："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唐朝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官吏叫徐宗干，他做官必修志，在任泰安知县、高唐知州、济宁直隶州知州时分别主修了《泰安县志》《高唐州志》《济宁直隶州志》。有人问他是否贪图虚名，他回答说："知州知此州，知县知此县，不读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其所不知？避好名之名，而安于无知，吾弗为之矣！"清朝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王永江在清《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

地方志是一个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窗口。古人云："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村史馆考察。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志馆调研。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考察时，参观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场史馆。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方志了解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发展情况，用于科学决策的。

见贤思齐，努力成为"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明白人

清《云中郡志跋》说："史为古今之朗鉴，志乃薄海之南车"。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方之全史"。读志能坚定信仰，用志能开启智慧，修志能培育道德。何为明白人？明白人一定是信仰坚定、智慧圆满、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读志、用志、修志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门必修课。

通过读志成为方向明确、信仰坚定的人——对党忠诚

读志有助于了解过去，在与先贤对话当中感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从而坚定信仰，锚定目标，明确努力方向。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读志可以帮助自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南宋理学家朱熹出任江西南康知军时，留下了"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的佳话。清《合肥县志》记载了包拯"不持一砚归"的事例。北宋康定元年（1040 年），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他到任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三年后卸任端州知府时"岁满不持一砚归"，清廉之名更是誉满朝野。我国历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乡贤资料。明朝朱栴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建乡贤祠。清朝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读志令人效法古代先贤、坚定信念、涵养道德、培育高尚的价值观，具

有重要意义。

通过用志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成为知止知变、智慧具足的人——勇于担当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就是用智慧去把握规律、指导现实工作。通过借鉴历史智慧，更好地服务当下，体现出应有的担当。毛泽东同志把领导工作总结为两个方面：把方向、用干部。而把方向就是第一个看到桅杆顶的人，即先知先觉。如何能做到先知呢？就要从前人、从历史、从志书中去得到启迪，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借鉴。明末顾炎武征引千余部地方志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清《保宁府志序》说：“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1961 年夏，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曾览读过由方志学家吴宗慈于 1930 年主编的《庐山志》。他对当地党委宣传部部长厚万仁说：“你们这些庐山的父母官，就是要多看看历史书籍。这部《庐山志》就是一部好书。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今的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啊！”又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观今鉴古嘛！”1989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李拔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志书既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冯梦龙也讲，‘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点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

通过修志，成为律己利他、道德高尚的人——纯洁干净

大道之德——以无我为心，以天下百姓心为心。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范。

修志是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文化活动，是总结前人与鞭策自己相统一的过程。修志可以见贤思齐，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对于领导者而言，修志可以让其牢记初心，不忘本源，去除浮躁，坚守底线。因为后来者会修当下这段历史，会如实记录这一任领导的功过得失，所以修志是领导者自我警示反思、提升能力素养的过程。宋《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朝郑兴裔热心倡修方志，在庐州和扬州任地方官期间，他分别主修了《合肥志》和《广陵志》。他认为编修地方志乃地方官之责任，他说，如一地掌故，“终令沦亡，殊非守土牧民之责！”

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方志文化是饱含着历代先贤用汗水和心血汇聚成的奔流不息的历史文化长河，方志事业得到了历史上贤明当政者的珍爱和重视，方志实践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的史志观，坚定人民至上的志德，增强方志文化自信，弘扬方志人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方志出版社社长）

2021年天津市地方志工作要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开局之年，是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开启之年。全市地方志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深入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全面提升依法治志水平，秉承“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使命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市委、市政府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对我市地方志工作“两全目标”提前全面完成的肯定和勉励为动力，以更高的目标追求、更积极的工作姿态，开创天津地方志事业新局面，全面贯彻规划纲要，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方志工作政治方向

1.强化政治引领。全市地方志系统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看家本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筑牢思想根基，把牢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把握正确导向，营造浓厚氛围，以党史学习教育的扎实成效助推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优质发展。

2.增强政治能力。坚持政治立身，加强政治能力建设，深刻领会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决策意图，自觉在大局中谋划、推动地方志工作，使地方志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加强党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巩固机构改革成果，完善地方志工作体制机制。全市地方志系统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更多志鉴精品，讲好“四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用地方志记录好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成就，记录好天津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奋斗历程。

二、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十四五”时期地方志工作以及第三轮修志工作

3.高标准编制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中指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为指导，在对“十三五”时期我市地方志工作全面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高标准编制我市地方志“十四五”规划，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出台后及时印发，并做好规划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4.科学规划第三轮修志工作。对我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存在的短板、注意的事项等进行全面分析评估，为第三轮修志提供借鉴。2021年，开始科学编制第三轮修志规划，筹备开展第三轮修志试点。各区要积极落实市方志办要求开展好第三轮区志（符合条件的区）编修工作并参照市级方案要求组织开展

本区第三轮修志工作。有关市级单位和部门要严格落实《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接受市方志办的指导和督促检查，积极主动组织开展修志工作。

三、深入推进志鉴史编纂和方志馆建设

5.志书编修扩面提质，实现高起点、大纵深。根据中指办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在第三轮志书编修中突出以部门、单位为重点方向，特别是从未编修志书的部门、单位。加大对专业志、部门志编纂的指导推动力度，制定相关规定、办法。积极落实中指组关于“十四五”时期实现乡镇志、村志、社区志全覆盖的要求，兴起全市各区的志书编修延伸工作，做到“能延尽延”，保证各区都有延伸的志书编修成果。继续组织编修《天津抗日战争志》，年底力争完成初稿。组织编修《天津扶贫志》《天津全面小康志》。积极配合中指办编修国家重大专题志《中国扶贫志》《中国全面小康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志》，做好相关保障。

6.推进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巩固成果、创新发展。做好《天津年鉴》、各区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巩固全市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成果。不断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有计划地推动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各级部门开展年鉴编纂工作。加强对各类专业年鉴编纂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在目前全市专业（部门）年鉴编纂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专业（部门）年鉴编纂工作。

7.志鉴精品工程再上新水平。一是大力推进名志文化工程。对已入选中国名镇志、名村志的《团泊镇志》《精武镇志》《杨柳青镇志》《咸水沽镇志》《王顶堤村志》，继续加强指导，完成志稿审定、交付出版。启动已入选中国名街志的《五大道街志》志稿编纂，年内完成初稿。做好后续名志文化工程推进工作，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区申报“名志”。二是推动精品年鉴申报工作。严格执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和《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规范编纂出版流程，完善年鉴质量评审制度，严把质量关，指导和推动各级各类年鉴申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8.稳步推进地方史编著工作。一是对已启动地方史编著工作的区加强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区开启地方史编著工作。二是广泛收集和征集相关资料，做好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和天津地情资料丛书编辑出版工作，按照《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和天津地情资料丛书编著出版实施办法（试行）》，严格程序、严格标准、严格质量编著《天津地方史丛书》《天津地情资料丛书》。三是大力开展旧志（文献）整理和影印工作。四是各区方志办和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成员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资料的收集编纂，市方志办加强指导，并对各单位的资料进行汇总编辑，高质量完成《天津抗疫实录》出版工作。

9.全面推进方志馆建设。按照中指组《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和《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进区级方志馆建设的通知》要求，推进市、区方志馆建设。市方志馆建设与市档案馆改扩建工程同规划、同部署、同推进。各区要将方志馆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有改扩建或新建任务的档案馆应将方志馆建设纳入，同步建设，已完成建设任务的档案馆要确保方志馆有独立空间和专门设施配置。已完成建馆任务的以及年内改扩建或新建任务能够完成的区档案馆应实现方志馆挂牌。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方志馆、地方史馆。做好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地方志文献和地情资料收集整理，通过订购、捐赠、交流、征集等多种

途径，丰富馆藏资源。扎实做好地方志资源的编辑研究工作，让“沉睡”的史志资料“活起来”。

10.高质量做好《天津史志》期刊编发工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宗旨意识、阵地意识、精品意识。各区方志办要踊跃投稿，每年采用稿件不少于3篇，其中至少2篇以上具有较高的业务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鼓励市级单位、部门积极投稿。让《天津史志》成为全市方志人交流思想、切磋业务、学习进步的家园。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社会利用水平

11.扎实开展信息化建设。推动志、鉴、史、刊等地情资料数字化建设，提高方志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结合实际完成二轮志书的数字化转换，立足现有条件分批对馆藏旧志和老地情资料、老照片等进行数字化。做好地方志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开通、使用和维护，及时发布原创信息、转载信息，分批上传志书、年鉴、史志等各类电子版资料，向社会各界提供数字版查阅利用服务。

12.深入开展“互联网+地方志”活动。丰富和发展网络方志文化内容，创新方志文化传播表现形式。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加强向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宣传推介工作。积极开展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即“七进”活动。鼓励社会各界以影视作品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形式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依法对地方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大力推进综合年鉴、专业年鉴、部门年鉴移动阅读手机版（掌上年鉴）启动建设工作。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交流，适时召开媒体座谈会、新书发布会，积极向社会推介和宣传方志工作，让地方志事业“立起来”“火起来”。

五、推进依法治志，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13.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制定出台《天津市专业、部门志书编修规定》，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全市专业（行业）志书、部门志书编修工作；印发《天津市专业和部门年鉴评审及审查验收规定的通知》，为三轮修志做好资料准备。

14.着力提升地方志业务水平。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精心组织举办志书、年鉴、地方史、方志馆等业务培训。举办方志文化讲堂，邀请地方文化、地情研究等专家、老师授课。结合实际，聘请全国方志专家和领导，开办高水平业务讲座和专题培训，着力提高我市方志工作者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落实中指组地方志援藏援疆部署，邀请西藏、新疆对口援助地区地方志工作人员来津参加培训。

15.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根据市档案馆（市方志办）年度调研工作计划，结合方志工作实际，确定好年度调研课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策性研究，着力解决当前影响和制约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6.强化方志力量。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与共建，充分发挥档案方志专家库作用，大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加强高层次、高质量方志专业人才，尤其是新媒体融合方面的方志人才培养，力争推出具有全国知名度、政治素质高、专业水平强的方志专家。

2021年我市地方志重大工作多、重点任务多、创新要求高，全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早部署、早协调、早启动，充分发挥集体决策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经验、专家人才的智慧力量，拿出“跳一跳、够一够”的进取心和作风，全面、深入、圆满推进好、完成好目标任务，以铁一般的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力量，以一流的业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4月9日

关于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报告

天津市档案馆副馆长　吴爱民

2021 年 3 月 31 日

同志们：

按照市委的安排，受市档案馆党委委托，下面由我对全市地方志工作作报告。一会儿，市委副秘书长李晶同志还要作重要讲话，请大家抓好落实。

一、2020 年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指导下，全市方志部门和方志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承“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地方志业务工作，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1.圆满完成市、区两级二轮修志任务，中指组和市领导对我市地方志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在提前一年全面完成“两全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编修成果，《纪律检查志》《人民政府志》《公安志》《司法行政志》《农业志》《水务志》《园林志》《文物博物馆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社会科学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妈祖文化志》等 12 部市志，以及《河东区志》《东丽区志》《西青区志》《蓟县志》等 4 部区志，完成了印刷发行。同时，所有已出版二轮志书的入库和电子版存档工作全部完结。

中指组对我市提前完成“两全目标”给予高度肯定，专门向天津市委致信祝贺，鸿忠书记、国勋市长作出重要批示，对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表示祝贺和致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向全市地方志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致信嘉勉。

2.年鉴工作成效明显，获得新突破。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全覆盖成果不断巩固，在市、区两级方志办共同努力下，加大工作力度，改进工作方式，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印刷出版进度，至去年 11 月底，《天津年鉴》及 16 个区综合年鉴全部落实了书号，并全部完成初稿，进入出版环节。专业、部门年鉴得到较好开展，2020 年《天津科技年鉴》《天津水务年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天津教育年鉴》《天津建设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天津财政年鉴》《天津社会科学年鉴》《天津规划和自然资源年鉴》《天津邮政年鉴》《天津南开中学年鉴》等 11 部年鉴公开出版。年鉴精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北辰年鉴（2020）》成功入选中国精品年鉴，实现了我市在中国精品年鉴评选中零的突破。2020 年，我市 4 部年鉴申报参评第七届全国地方志（年鉴类）优秀成果，全部获奖，分别是：《天津年鉴（2019）》获省级综合年鉴三等奖、《滨海新区年鉴（2019）》获县区级综合年鉴二等奖、《北辰年鉴（2019）》获县区级综合年鉴三等奖、《天津规划和自然资源年鉴（2019）》获地方专业年鉴三等奖。

3.方志馆建设和方志数字化工作加快推进。根据中指组《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市方志办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天津市区级方志馆建设的通知》，全市16个区均将方志馆建设纳入档案馆建设同步规划，目前平均规划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新组建的市地方志馆正式揭牌，方志文献资料室提升改造完成并恢复开放，6000余册方志文献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查阅利用。《天津史志》期刊阵地作用充分发挥，全年编发6期、发行6000余册，各区方志办积极开展方志理论研究，踊跃供稿，宝坻区、蓟州区、北辰区和武清区较为突出，供稿量均在10篇以上。地方志文献交流工作有力开展，全年接收本市二轮志书3000余册，与兄弟省市交流入馆文献资料200余册。加快推进“一网一号”建设，对原地方志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与市图书馆合作，完成了130余册第一轮志书的数字化转化，并上传地方志网，向社会各界提供网上查阅利用服务。

4.精品名志审核报送工作扎实开展。《杨柳青镇志》《精武镇志》《咸水沽镇志》《团泊镇志》《王顶堤村志》入选新一批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并按中指办要求完成了志稿修改，其中《杨柳青镇志》已进入出版印刷阶段。和平区《五大道街志》获评中国名街志文化工程。

5.“十四五”规划编制顺利推进。在对“十三五”规划全面总结，深入各区和有关单位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我市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初稿。

6.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起草印发《天津市市级专业志书报备管理工作规定（试行）》和《天津市市级专业年鉴报备管理工作规定（试行）》，加强对市级专业志书、年鉴的统一管理。制定出台《天津市区级地方综合年鉴印刷工作规范（试行）》，从版式设计、编纂管理、印刷质量等方面对年鉴出版印刷作出规范。

7.《天津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有序推进。各承编单位和专家深入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密切协同配合，按照《天津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方案》和推动会精神，克服疫情影响，不断推进编纂工作，完成了志书篇目结构的制定和大事记初稿的编写。

8.地方志对口援藏援疆工作富有成效。扎实落实中指组《关于全国地方志系统支援西藏、新疆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市方志办制定出台《关于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落实对口支援西藏新疆修志编鉴工作方案》，协调推动河西区、河北区、南开区、西青区、北辰区、武清区、静海区、宁河区落实已签订的对接援助任务书。通过电话和网络开展业务咨询和答疑，并专程赴新疆于田县、策勒县、民丰县，西藏昌都市卡若区指导志书、年鉴编纂工作。

9.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组织河东区、北辰区、红桥区、南开区、东丽区、西青区6个区方志办主任参加全国地方志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有力提升区方志办主任综合能力。积极参加全国地方志学术交流活动，《机构改革对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多篇学术文章入选“全国方志论坛暨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学分会年会”参会论文，有效提高方志工作者业务水平。

近年来，我市地方志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些都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中指组的精心指导，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市方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与市委市政府和中指组的要求，与地方志

事业发展先进地区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的差距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方志工作队伍稳定性不足，人员整体素质与事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影响了地方志工作水平的提升。二是地方志编修的覆盖面不够广，市、区两级部门、单位修志还有“死角”，个别重点行业志书编修工作尚未启动。三是地方志成果利用形式比较单一，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还非常有限，影响了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四是方志数字化工作进度不够快，影响了方志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五是地方志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仍显薄弱，市方志馆以及大多数区方志馆面积尚未达到国家标准，影响了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发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寻求有效途径，切实加以解决。

二、全力做好 2021 年重点工作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总结二轮修志、谋划启动三轮修志的总结年、提升年。全市地方志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担当作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实现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1.紧紧围绕建党百年主题开展地方志工作。全市地方志系统要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题，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政治担当，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谋划开展修志、存史工作，推出资政成果，发挥育人功能。

2.科学规划“十四五”时期地方志工作以及第三轮修志工作。高标准编制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并做好规划的学习、宣传和贯彻。2021 年，开始科学编制我市第三轮修志规划，筹备开展第三轮修志试点。各区要积极落实市方志办要求，组织开展本区第三轮修志工作。有关市级单位和部门要严格落实《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积极主动开展修志工作。

3.深入推进志书延伸和专志编修。落实中指办关于“十四五”时期实现乡镇志、村志、社区志全覆盖的要求，兴起全市各区的志书编修延伸工作，做到“能延尽延”，确保各区都有延伸的志书编修成果。根据中指办的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在第三轮修志工作中，大力加强部门、单位志书编修，以从未编修志书的部门、单位为重点，努力实现部门、单位修志全覆盖。组织编修《天津扶贫志》《天津全面小康志》，积极配合中指办编修《中国扶贫志》《中国全面小康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志》等国家重大专题志，做好相关保障。

4.创新推进综合年鉴工作。做好《天津年鉴》、各区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不断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全面开发年鉴工具书功能，开展市、区两级“掌上年鉴移动阅读手机版”开发建设工作。推动地方史研究丛书和地情资料丛书工作有序开展，制定丛书编著出版实施方案，面向社会发布选题指南，年内完成 2 部书稿出版。全面启动旧志整理工作，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单位保存旧志情况进行摸底，制定旧志整理工作实施方案，完成《天津市旧志整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专题调研报告。

5.全面推进方志馆建设。以中指组《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为指导，出台《天津市方志馆建设规范（试行）》，着力推进市、区方志馆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建立方志馆、地方史馆。高质量做好《天津史志》期刊编发工作，各区方志办要踊跃投稿，每年采用稿件不少于3篇，其中至少2篇以上具有较高业务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鼓励市级单位、部门积极投稿。

6.志鉴精品工程再创新业绩。一是大力推进名志文化工程，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区申报“名志”。二是着力推动精品年鉴申报工作。三是稳步推进地方史编著工作。四是高质量完成《天津抗疫实录》编著出版。

7.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开放的地方志资源共享平台和全文数据库，构建多界面、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地方志信息化服务体系。

8.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印发《天津市专业、部门志书编修规定》，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全市专业（行业）志书、部门志书编修工作；印发《天津市专业和部门年鉴评审及审查验收规定的通知》，为三轮修志做好资料准备。

9.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举办志书、年鉴、地方史、方志馆等业务培训，举办方志文化讲堂，邀请地方文化、地情研究等专家、老师授课，聘请全国方志专家和领导开办高水平业务讲座和专题培训等途径，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地方志人才队伍。在全市地方志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吴志宏、建功新时代”主题宣教活动，争当新时代吴志宏式方志人。

三、要强化使命担当、展现方志作为

做好新年度工作，全市方志部门必须要有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高强的业务本领，一流的队伍形象。必须牢固树立方志文化自信，矢志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把冷板凳坐热”“把冷部门做热”。

1.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理论武装，突出政治引领。

2.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指示、要求落实到工作全过程。要直笔修志，让每一部志书的史实性和资料作用都经得起历史、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检验；要让志书充分发挥资治作用，让人们从看志和用志中得到启迪，汲取智慧；要让每一个方志工作者都钻得进“故纸堆”，干得出“得志”的事业。

3.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地方志横陈百科，纵贯古今，不能搞“单打一”，要广泛动员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做到众手成志。要积极与上级领导沟通，主动汇报工作，赢得支持，获得帮助。

4.要把志书质量作为生命线。真实、准确是志书的根本，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修志工作要从一开始就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把精品意识贯彻到全过程和所有环节。修志工作者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自觉树立精品意识，让每一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是精品名志。

同志们，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坚定信心、担当奉献，奋力开创我市地方志事业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方志力量，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学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情况

【滨海新区】

3月17日，滨海新区档案馆方志工作部组织开展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专题学习会。

会上学习了《吴志宏：用行动和生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大山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追记红河州扶贫干部吴志宏》《吴志宏：驻村扶贫好干部》等宣传文章。吴志宏是新时代矢志不渝、淡泊名利、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地方志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学习宣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方志部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志宏同志精神，担当作为，无私奉献，“把冷板凳坐热”，努力完成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滨海新区年鉴（2021）》等各项工作。

大家被吴志宏同志初心如磐、使命至上的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心系群众、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忠厚持家、大爱无疆的传统美德所感动，展开了热烈讨论，交流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向吴志宏同志学习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要将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作为党性教育、支部学习会重要内容，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发扬吴志宏爱岗敬业、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甘于奉献精神，扎实有效做好本职工作，为地方志事业尽心、尽职、尽责，并做出应有贡献。（滨海新区档案馆）

【河西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学习宣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精神，河西区档案馆积极行动，扎实开展学习贯彻活动，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向先进学习，向典型靠拢，向标杆看齐，不断提升方志工作者先进水平。

会上，认真学习传达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的文件内容，由河西区档案馆办公室主任宣读了吴志宏同志的简历及感人事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方志系统及方志工作者的嘉勉信的相关通知要求，按照广泛宣传贯彻吴志宏同志先进感人事迹，不断深入学习吴志宏精神、争当新时代吴志宏式典型人物等多方面进行学习、宣传、研讨、总结。要把学习吴志宏同志的先进典型事迹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锤炼政治品格，弘扬担当精神”大学习大讨论以及当前的“四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积极作为，不断奋进，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发挥方志人“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神圣职责，勇挑重担，勇攀高峰，充分发挥“冷锅冒热气”的精神，切实把学习宣传教育活动落到实处。

全体干部一致认为，要主动与吴志宏同志对标对表，发扬他敢于吃苦、勇于担当的精神，甘守清贫，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馈组织、回馈人民、回馈社会。经过学习，全体方志工作者的使命信念更加坚

定，表示一定要牢记初心使命，心系党、国家和人民，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优异的成果为河西区打造首善之区、品质城区升级版贡献方志人的智慧和力量。

（河西区档案馆）

【北辰区】

3月19日，北辰区档案馆（区方志办）举行学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专题学习会。会上，区档案馆馆长王春玲传达学习天津市档案馆（市方志办）下发的《关于印发〈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学习吴志宏、建功新时代”主题宣教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领读了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并对档案方志干部提出具体要求。

王春玲指出，通过学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自身聆听吴志宏同志父亲所作的感人报告，可以深切感受到吴志宏同志坚守初心、不忘使命的优秀共产党员素养，可以深度体会到吴志宏同志默默无闻、一心奉献的地方志工作者精神，可以深刻领悟到吴志宏同志艰苦朴素、为民请命的扶贫村干部作风。她强调，全馆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相结合，与学习党史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市方志办的通知要求和下发的实施方案，结合北辰区实际，开展主题宣教活动。

为开展好“学习吴志宏、建功新时代”主题宣教活动，区档案馆（区方志办）结合北辰档案方志工作实际，制定了学习先进主题宣传教育实施方案，采取开展“三个一”活动等措施，不断加强地方志工作者的理想信念教育，见贤思齐、对标对表。在中指办和市档案馆（市方志办）的大力指导下，在志书编修和精品年鉴上持续发力，为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贡献北辰力量。

（北辰区档案馆）

【宁河区】

根据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宁河区档案馆高度重视，及时开展向吴志宏同志学习活动。结合党支部集中学习日在机关开展向吴志宏同志学习活动，党支部书记、馆长李卫东亲自主持，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分管方志工作的副馆长李娟组织志鉴编研科的3名同志学习了吴志宏同志的先进事迹，并结合工作实际分别交流了心得体会。

党支部活动中，传达了市档案馆（市方志办）《关于印发〈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学习吴志宏、建功新时代”主题宣教活动实施方案〉》通知的文件精神，并将《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学习吴志宏、建功新时代”主题宣教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对下一步学习宣传吴志宏同志先进事迹进行了周密部署。

此次活动，进一步营造向先进榜样学习、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不仅激励了志鉴编研科工作人员，也激励了其他科室工作人员接续奋斗、扎实苦干的精神。志鉴编研科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学习吴志宏同志初心如磐、使命至上的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心系群众、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忠厚持家、大爱无疆的传统美德，发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方志人精神，为宁河方志工作的“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宁河区档案馆）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研究方向

王　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的天津，地处华北地区重要位置，政治、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在这种形势下，一代代革命家前赴后继，矢志不移地向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觉悟社、女星社等进步团体，让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这方热土生根发芽。笔者将近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研究成果及方向做一综述，以供读者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宏观研究

夏静雷《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北京党史》2020 年 2 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经历三个阶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天津；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等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和帮助下，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天津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建党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更为广泛深入，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天津地区的进步团体，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天津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促进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夯实了基础。周巍《红色起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求知》2017 年 5 期）指出，1911 年天津出版的《维新人物考》和 1916 年出版的《敬业学报》都提到了马克思，但未引起人们注意。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天津，先进分子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并逐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先芝《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早期传播研究（1919—1927 年）——以京津地区为例》（青岛科技大学，2019 年）指出，京津地区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也是党最早开辟工人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探讨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京津地区工人阶级中的早期传播，对于认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和阶级性，坚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维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京津地

区传播，为京津地区工人运动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工人运动更深入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金宕蒔《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及进步组织成立》（《求贤》2009 年 3 期）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去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新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得到了广泛深入传播，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天津先进分子增加了对苏俄十月革命的了解，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希望，并找到了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后，天津已经聚积起相当雄厚的革命力量。李大钊将天津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可靠阵地，加强与苏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与沟通。期间，天津先进分子多有参与其事者，为天津建立早期社会主义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王永立《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求知》2011 年 5 期）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对危难深重的祖国，一些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求索的目光投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在世界范围内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时间，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被介绍到国内，令人目不暇接。正当此时，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8 年 2 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宣布无条件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消息传到天津后，在天津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由此看到了苏俄政府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仿佛看到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新希望的曙光所在，因而开始更多关注苏俄内外政策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有关情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天津传播打开了大门。马媛《五四运动在天津》（《传承（学术理论版）》2009 年 3 期）指出，天津在五四运动中虽不是全国斗争重心，但它以独有的特点，对全国运动起了重大推动和影响作用。运动中产生了周恩来、马骏、于方舟、郭隆真、邓颖超等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先进分子。他们在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和争论中，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天津播下革命火种。梁丽辉、受志敏《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证分析——以天津工人学哲学为例》（《学理论》2013 年 13 期）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但其发展历程却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紧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英化的步伐。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这是一次真正的比较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这有赖于党的领导、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其中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很有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社团及单位研究

李延华、王颖《浅探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9 年 5 期）指出，觉悟社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中，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乃至北方地区传播，留下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实践经验。运用传播学的知识，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两个角度，探究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分析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点，阐明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的贡献，有利于深化对觉悟社的历史研究，借鉴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启示。郭辉《对觉悟社存在时间的再思考》（《中国纪念馆研究》2015 年 1 期）认为，觉悟社作为天津男女进步青年合组的社团，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成立，被誉为当时“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组合的小团体”。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团体，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却很不够。与同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比较，对觉悟社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觉悟社存在的时间，学术界对此模糊不清，对进行深入研究造成了障碍。因此，考证觉悟社存在时间下限对于了解觉悟社发展与演变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邱文利《觉悟社成立背景及建立经过探微》（《鲁迅研究月刊》2016 年 4 期）指出，觉悟社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它产生和存在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段时期。作为天津学生组织较早、成绩卓著的社团，觉悟社成立后，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高度期望。徐娜《觉悟社：百年初心矢志奋斗》（《求知》2020 年 1 期）指出，百余年前，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先进青年在天津海河河畔发起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团体——觉悟社。觉悟社以“革心”“革新”为宗旨，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为被压迫人民谋幸福，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邱文利、郭辉《觉悟社早期组织及活动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8 年 4 期）指出，觉悟社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不久，作为天津男女进步青年合组的社团，被誉为“天津的小明星”。觉悟社从 1919 年 9 月 16 日建立到 1924 年下半年结束，共存在了 5 年时间，以 1920 年 11 月，社员星散为界标，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随着斗争经验的积累，觉悟社这些核心社员在学生运动和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领导作用，并在爱国运动和不同思想激荡中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提出了“改造联合”的主张，倡议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他们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和对新思潮的追求，逐渐成长起来。大多数成员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优秀分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李延华、王纳《女星社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党史博采（理论版）》2020 年 10 期）指出，女星社是邓颖超青年时代在天津创办的妇女运动进步团体。女星社不仅关注妇女权益，而且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通过创办报刊，开办妇女补习学校以及利用纪念活动等，唤醒妇女觉悟，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推动马

克思主义传播，为天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增添了光辉篇章。陈学峰《试论周恩来与觉悟社》（《党史文苑（学术版）》2008年5期）认为，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进步团体中，觉悟社很有代表性。它一创立就成为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核心力量，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在觉悟社整个活动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觉悟社刊物《觉悟》的主编是周恩来；《觉悟》上反映觉悟社思想倾向的几篇主要文章，如《〈觉悟〉的宣言》《觉悟》《学生根本的觉悟》《工读主义》等，都是出自周恩来手笔；觉悟社不设“会长”“副会长”一类头衔，但实际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组织领导者，是觉悟社的灵魂。刘桂芳《天津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而作》（《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年4期）指出，在天津“马克思”这一名字，最早见于1911年天津出版的《维新人物考》中，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使天津先进革命组织和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以饱满的热情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救国真理，掀起了宣传马列主义的热潮。专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马氏通讯图书馆”和“天津工人图书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成为我党早期在天津播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阵地。

三、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者研究

张绍祖《李大钊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天津政协》2011年）指出，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是天津工人运动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为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在天津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天津党的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在中共天津地方党史上留下了闪光的篇章。马书静《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研究：实践活动与思想理论（1920—1925）》（天津大学，2018年）指出，张太雷作为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在其革命生涯中，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今天青年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青年思想。通过对张太雷在天津从事青年运动实践活动的梳理，分析了他在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建树，论证了他在青年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对青年运动的现实指导作用。蔡文杰、刘玉珊、王岚《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期）指出，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活动是对张太雷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天津是张太雷革命生涯的摇篮，厘清张太雷在天津的学业和社会活动，分析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张太雷一生革命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在天津的5年时光里，张太雷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而且关注社

会政治，注重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卓越的组织和宣传才能。同时，张太雷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一个爱国青年向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转变，并在天津及周边地区积极从事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丁言模《张太雷与天津建党建团的问题》（《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3 年）指出，张太雷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天津第一位中共党员，第一任天津青年团书记，为创建京津党团组织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张太雷一生做得多，说的相对少，不愿意事事张扬，这与他沉稳，机敏，冷静的个性有关，加之留存的各种档案史料记载他的言行并不多，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从各种史志资料中厘清张太雷与天津建党建团的关系，对研究天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非常重要的。孟罡《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生涯》（《求知》2018 年 1 期）指出，革命先驱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前身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要创始人之一。张太雷早年在天津求学和投身革命，是天津第一位中共党员，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太雷在天津创建并领导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推进党、团工作发展，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琼琼《五四时期周恩来的信仰选择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党史文苑（学术版）》2013 年 11 期）认为，五四时期，周恩来由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引起周恩来信仰选择转变的原因，包括当时的时代背景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优势。与此同时，周恩来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他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提出了“改造”和“联合”的思想；在实践方面，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月刊；创建了觉悟社，团结领导进步力量同反动派斗争。周恩来的信仰选择对当代青年的信仰选择也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孟罡《矢志不渝求真理　英勇无畏为人民——记彭真在天津的革命生涯》（《求知》2020 年 4 期）指出，彭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天津是彭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他深入工人群众，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力推动了北方和天津革命形势的发展，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期间，彭真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展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王明辉《英名垂千古　业绩启后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闯将马骏》（《求知》2020 年 5 期）指出，马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与周恩来、邓颖超等 20 名同学联合成立了著名的青年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被奉系军阀杀害。马骏短暂的一生，始终以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求索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趋势

未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趋势，笔者认为可以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高研究专著的数量和质量

天津作为李大钊、张太雷、周恩来等革命先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仍需要更多的专著来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与未来发展，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进行定位。

（二）展现其他社团的风采和特色

社团研究方面，觉悟社的存在时间、成立背景及建立经过、早期组织及活动等方面留下来的资料较多，可利用的材料也较为丰富。而女星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五五书报代卖社、天津真学会等社团组织的研究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些团体在革命先辈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上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如《新生命》是天津真学会创办的刊物，以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该刊发表《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一文，客观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强调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是革命成功的群众基础，而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则是革命成功的思想之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很大。又如 1922 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马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氏学说有关的书籍”，既有马克思、列宁的珍贵文献，又有学习、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资料。这些社团的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是今后我们关注的焦点。

（三）拓展文献开发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天津对关于李大钊、周恩来等革命前辈的文献资源开发较为完善和具体，也有专门组织和机构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下一步可以考虑在继续利用现有革命文献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线索，拓展新的领域。其中五四运动后，天津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彻底消除误解和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所撰写的文章，如《社会主义派别与其批评》，列举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观点，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与传入中国的简况。这类文献资源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也是学界未来研究的一大方向。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的研究相对关注重点人物和重点社团，这也是由天津这座华北经济、政治、文化重镇的定位所决定的。天津在近现代经济发展较快，政治思潮动荡，文化大家汇聚，本就是多方思想交融冲撞的场所。李大钊、张太雷、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天津开展形式多样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些传播者播撒的红色种子生根发芽，使无数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便是星星点点的马克思主义社团，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一个个社团的传播下遍及天津、华北乃至全中国。时值建党百年，探究革命先辈的人生轨迹，挖掘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是青年人的责任，也是时代的重托。

〔作者单位：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从津门红色遗址中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力量

王　炜

中国革命的发展史是一个历尽艰辛而又辉煌伟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屈辱的血泪史，有英勇的抗争史，更有不懈的奋斗史，正是在这样的砥砺前行中，无数革命先驱为追求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用坚定的信仰和滚烫的生命点燃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也正是这些星星之火，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红色革命的足迹。天津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近代以来，为反抗外敌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天津人民进行了一次次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从大沽口传来的激烈枪炮声，到望海楼腾起的滚滚浓烟，再到辛亥革命的刀光剑影，一个个英勇悲壮、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充分体现了天津人民不惧强敌的爱国情怀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1]一辈又一辈革命者的足迹遍布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直至今日，这些共产党人战斗过的地方留下来的革命精神，仍旧在不断的指引我们前行，传递着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

一、天津红色遗址中记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反帝爱国为主要标志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天津的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天津涌现出周恩来、马骏、张太雷、于方舟、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一批先进青年，他们站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线，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从而迅速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天津革命运动逐步兴起，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

1924 年春，在中共北京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天津成立了由 5 名党员和候补党员组成的党小组，由于树德任组长。在天津党小组的建立和团组织快速发展的基础上，9 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方舟当选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为发展天津的革命形势，先后作出了关于开展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心任务是发动工人和各界

[1] 王燕：《新时代传承红色文化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2] 晋中市委讲师团课题组：《对做大做强晋中红色文化品牌的再思考》，《先锋队》，2015 年第 28 期。

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以工人运动为主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起来，革命高潮蓬勃兴起。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致使由国共合作后形成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的严酷摧残，天津的党员数量锐减，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为了恢复和加强党在北方的组织和斗争，中共中央先后建立了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等重要机构，统一领导北方各省及天津的革命斗争。1927 年 8 月，中共天津地委改组为中共天津市委。此后，中共天津市委在极其严峻的斗争环境下，坚持领导天津革命斗争的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党组织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一直在天津市内坚持斗争。从沦陷初期的中共天津市委，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再到抗日战争后期各抗日根据地在天津建立的各级基层组织，都灵活机动地以各种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与此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天津周边区县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创立盘山抗日根据地，开辟抗日游击区，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壮大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经过长达 14 年之久的抗战，天津人民终于在党的领导下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从 1945 年冬起，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抗议美军暴行以及反饥饿反内战等一系列斗争，形成了与解放战争相互配合的第二条战线。1948 年 12 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时，天津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组织护厂、护校，一方面为解放军搜集敌军情报。在解放军和天津地下党的互相配合下，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二、天津红色遗址中贮存着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

天津总面积 11903 平方公里，自古因漕运兴起，1860 年开埠通商后，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天津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也是北方较早进行反帝爱国运动的地区之一。大沽口炮台见证了晚清抗击西方列强的悲壮；清朝灭亡后，这里是周恩来开始革命工作的地方；孙中山曾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住在天津，指导革命；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蓟县是冀东抗日活动的中心之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此发动了天津攻坚，取得平津战役决定性胜利，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天津除 1958 年至 1967 年是河北省省会以来，一直是中央直辖市。天津作为北方较早进入革命抗争的地区，经历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其红色遗址也就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天津的红色遗址中，能够看到天津人民用血肉一次次抵抗外来侵略，反抗内在压迫，不断进行革命斗争，完成历史转变的过程。从望海楼到大沽口炮台，从觉悟社到《大公报》报社旧址，从天津学生联合会到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再从于方舟故居到北方书店……每一处红色遗址都充分体现了天津人民不惧强敌

的爱国情怀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1]

天津红色遗址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铸就的革命精神的宝贵源泉。天津红色遗址遗迹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传承历史、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为后人留下了更多了解历史的最真实的范本，在红色遗迹的探寻过程中，能够看到当时的时代所蕴藏着的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在传承文化基因，弘扬革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培育新思想，争做新青年，指引更多的人进入到历史的了解阶段。帮助更多的青年了解历史，不忘国耻，在思想的进程中，去探寻后续社会发展的真正道路，这是红色遗址所能起到的作用。在红色遗址的保存过程中，能够让更多的后人看到特定环境下革命先驱奋斗过的地方，切身实地的感受革命先驱奋斗时洒下的热血，感受红色基地中蕴藏的文化内涵。作为文化最深厚、最真实的载体，它具有自我厚重的历史特性，需要通过不断的挖掘，发现历史遗留下来的红色遗迹中坚韧的文化内涵，不朽的民族精神。

三、天津红色遗址中蕴含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力量

我们如今所说的红色遗址遗迹，既包括党的重要机构旧址、重要事件遗址、革命先驱故居、革命运动（活动）场所，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在遗址基础上修建或兴建的纪念馆、纪念园、烈士陵园等纪念设施。它们蕴含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积淀了我们国家和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无数先驱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斗争的见证，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更是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投身革命事业的力量源泉。

1. 大沽口炮台遗址

炮台初建于明代嘉靖年间，鸦片战争前后大规模扩建。清咸丰八年（1858），为加强海防，确保京城安全，清政府在南、北两岸修筑“威”“镇”“海”“门”“高”五座大炮台和 20 多座小炮台，防务不断加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先后于 1858 年、1859 年、1860 年入侵大沽口，发动三次大沽口战役，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坚守炮台，壮烈殉国。1901 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拆毁炮台，后来只残留有南岸的“威”字和“海”字炮台以及北岸的“方”炮台。大沽口炮台是中华民族抗击侵略，不畏强暴的历史见证。

2.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

该校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总理天津女学事务的傅增湘创办，并自任监督。该学堂是天津最早的一所官立女子学校，校名经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等数次变更。该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五四运动时，天津著名的妇女团体——天津女界同志会就是由该学校邓颖超、郭隆贞、刘清扬、许广平等发

[1] 季宏、徐苏斌、青木信夫：《天津近代工业发展概略及工业遗存分类》，《北京规划建设》，2011 年第 1 期。

起组织的；天津最早的革命团体——觉悟社中的女社员也多是该校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该校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该校党组织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女同学会，带领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解放战争中，该校学生于 1947 年 5 月 19 日宣布罢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其在天津和中国革命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3. 中山公园

初名劝业会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建，1907 年建成，是天津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园；1912 年更名为天津公园，不久又改称河北公园；1928 年为纪念孙中山更名为中山公园。近代以来，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10 年 12 月 19 日，天津学生在中山公园集会，掀起资产阶级立宪请愿活动的热潮；1912 年 8 月 24 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途经天津时，在中山公园参加天津国民欢迎会，即席发表演讲，而后参观了设在公园内的国货陈列所；1915 年 6 月 6 日，周恩来在公园举行的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上演讲；1919 年 6 月 9 日，天津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举行大会，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行动，天津学联领导人马骏发表演讲。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公园被日本占据，遭到严重破坏；天津解放后，屡次修建。

4. 觉悟社旧址

五四运动之初，天津男女学生组织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1919 年 9 月 16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 20 名男女进步青年组成了革命团体——觉悟社。该社从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爱国力量开展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改造社会挽救祖国的革命斗争活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为该社杂志。该社在当时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1984 年河北区政府在原址上建设觉悟社纪念馆；1986 年邓颖超为该馆题写馆名。

5. 女星社旧址

女星社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分子创办的以“实地拯救被压迫的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宗旨的革命团体。该旧址为两合六间民宅院落，其房屋为砖瓦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为 216 平方米。女星社成立后，一面开辟舆论阵地，创办《女星》《妇女日报》，宣传妇女自救自决的思想；一面开办妇女补习学校和义务补习学校，推行女子教育，力图唤醒女子，培养其自主能力，以谋求妇女解放。女星社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摇篮，对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过广泛影响。

6. 天津广东会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会馆落成，当时正值我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同乡会以这里为基地，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封建统治、支持共和的运动。会馆的广场上经常举行大型集会活动，成为民国初期天津著名的三大群众集会广场之一。1912 年，孙中山在天津广东会馆发表了“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

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的著名演说。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与爱国女界同志会在戏楼舞台上演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募捐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天津广东会馆成立了天津总工会。

7. 东亚毛纺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剑指关内。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1932年4月15日，基于扬中国人威、长中国人志、与外货抗争的主导思想，爱国实业家宋棐卿创办了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开办了东亚毛纺厂并产出第一批毛线。宋棐卿将东亚毛纺厂的制品注册为“抵羊”牌，意为“抵制洋货”。东亚毛纺厂和“抵羊”牌毛线从此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东亚毛纺厂号召国人用国货，并以月租金四千元在日租界大罗天门口（现和平区鞍山道原天津日报社社址）竖起每字六尺的广告牌。

8.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于1936年3月到达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在领导北方局期间，正确地分析了北方的革命形势，全面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白区工作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巨大作用。该旧址始建于1915年，是中共中央北方局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在津的办公驻地，也是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居住过的地方，现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9. 盘山抗日标语石刻

抗日战争时期，冀东人民和八路军在盘山的岩石上留下了许多抗日标语。官庄镇玉石庄村北山石上发现了8条摩崖石刻，内容为“打倒日本”“给日本人做事可耻”“誓雪国耻”“欢迎满洲军兄弟投诚反正”“欢迎满洲队参加抗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正过来的有重赏”“你听，东北在哭哪，冷哪饿哪”，落款为“晋察冀军分区十三团政治部制”。在许家台乡田家峪白草洼，有“反对杀人放火的日本强盗”等十余条标语石刻，是抗日游击队于1940年至1941年刻写的。

10. 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旧址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中央军委便不失时机地作出部队停止休整、立即进军关内的战略决策。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迅速入关进军华北地区协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12月初，东北野战军总部经喜峰口进驻蓟县孟家楼，孟家楼成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解放军高级将领指挥平津战役的前线司令部。前线司令部在孟家楼村建立后，立即动员蓟县、武清、津南、宁河等县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全力支持解放军进行平津战役。

11.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杨柳青镇的一所四合院式民宅内设立了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时任东北野

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在此指挥了天津攻坚战。人民解放军于 1949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对天津发起总攻，次日解放了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1983 年天津市政府在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上建成陈列馆并对外开放。陈列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三部分：前线指挥部复原陈列、辅助陈列和天津战役英烈事迹陈列。此外，陈列馆还保存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敦促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的亲笔信，以及陈长捷制定的战时手令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1994 年该陈列馆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2.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

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 12 号，原是天津法国公议局大楼，始建于 1929 年，1931 年落成。该楼在天津各租界统治机构建筑中，是现存规模宏大，艺术水准高超，保存最完好的西洋建筑。日伪时期，该址曾改为伪“天津特别市政府”；1945 年驻津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仪式在此举行。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这里，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副主任。在这里，发布了一份名为《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的军字第一号布告。2006 年该建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每一处革命旧址、遗迹、故居，都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熔铸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承载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信念追求。天津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对于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讲好讲活红色故事、弘扬与传承红色基因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习近平总书记说：“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而红色遗址正是几代革命者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所在，我们要在充分汲取红色遗址养分的基础上，加强红色遗址保护和利用，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遗址背后的故事，盘活红色资源，使之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我们要全方位解读红色遗址，发挥宣传导向作用，让遗址中的红色文化成为新时代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继承和发展的主色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让红色印记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

[1] 郭玉军：《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浅释《天津抗日战争志》的记述时限问题

王中玮

2021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6 周年。76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人民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传承各地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 2016 年制定《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实施方案》，希望通过以志书形式把各地抗战情况记录下来。

在长达 14 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重地和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掀起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沦陷区工作的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群众，与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从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根据《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实施方案》要求，为记录天津抗日战争情况，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于 2018 年制定了《天津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开始编纂《天津抗日战争志》。

一、背景及依据

传统志书的编修在中国各朝各代连续不断。特别是每逢盛世，就必然出现一次修志高潮，而长治久安的社会往往每隔一定年限就续修一次志书。修志的连续性决定了地方志书的时限性。因为每一部志书只能反映本轮修志与上一轮修志期间本区域发生的各种变化，两轮修志之间所相距的年限，构成了志书所写内容的时限性。而新时期我们对一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事件进行修志（重大事件志），也是突出一定地域范围和时限范围。因为这种时限的存在，我们志书必然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特点也是志书应该具有的功能。

为了让当代中华儿女和后世子孙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史。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 2016 年制定《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实施方案》。之后多次召开会议就志书定位、分类标准、篇章结构、写作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概括规范。在 2018 年 4 月 25—26 日召开的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暨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抗日战争志的定位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志》是反映全国抗日战争的重大事件志，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是反映全国各地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件志。它们都不是综合志，而是重大事件志，其入志标准只有一条：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类或事件允许

入志。[1] 这就说明抗日战争志必须有其记述上限和下限。

《〈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实施方案》及《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实施方案》中将记述时限定为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即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必要时可上溯下延。就各地方而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时间各不相同。为了能够全面、客观、完整的表现整个抗日战争全貌，必要的上溯下延十分重要。

二、《天津抗日战争志》上限的确定

《天津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印发。记述上限为 1871 年 7 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天津谈判签订《中日修好通商条约》。为什么定在这个时间呢？还要从条约签订的背景和对天津造成的影响说起。

日本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也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外，明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并为此进行努力。但由于维新革命没有引起西方列强的重视，它的外交活动毫无进展。对内，由于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残余势力仍十分强大，导致的后果就是“使资本赖以生存的国内市场变的狭小，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2] 加之明治维新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触动了下层武士阶层，“武士阶层为了夺回失去的特权也在各地掀起了叛乱”。[3]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明治政府决定通过向外扩张缓解矛盾。

1870 年 6 月，日本外务省提出《外交急务四条》，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清晰可见：一是“日本外务省认为，在日本经商的中国人仍受欧美领事的管理，日本的法权不能对之行使，是不合理的”。[4] 二是因为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必须先与中国建交才能在法理上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成为朝鲜的上国，便于实施大陆政策。明治三年（1870）七月，日本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赴华谈判。同年 9 月，在天津与李鸿章举行了面谈，提出签订条约一事。李鸿章认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受英美法诸国之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5]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清政府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让李鸿章负责筹办签约事宜。

同治十年（1871）四月，李鸿章全权大使和伊达宗城全权大使，在天津开始谈判。一开始日方提出的方案中有“一体均沾”的条款，企图获得与西方国家相同权利，遭到清政府强烈反对。经过双方激烈攻防，日本在条约中有所让步。最后，双方在中国方案即所属邦国的保全、中日相互援助、排除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条款基础上达成协议。1871 年 9 月，双方草签《中日修好条规》与《中日通商章程》。其中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主要包括：二国互遣使臣；兵船泊驻口岸，不得驶入内河湖港；二国设立领事于口岸，凡在口岸商人之诉讼案件，归其审理，各照本国

[1] 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2] 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及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463 页。
[3]《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及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9 页。
[4] 魁喜：《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从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条规谈起〉》，《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5]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年，第 233 页。

律例核办，犯人入内地作恶者，由地方官处断；中国开放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汕头、广州、琼州，日本开放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潟、夷岛、长崎、筑地等等。

条规“其实很多内容都套用了西方条约，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都写了进去，不过它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适用于双方的，所以李鸿章认为这是一部平等条约”，[1] 曾国藩也以为中日订约之后，中国可以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约束本国商民，并设立会讯局，办华洋争诉案件，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洋之员侦办等。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给予中国这样的权利，于是他们认为该条规是可以签订的，可是他们却忽视了最重要一点，中国有没有能力行使这个权利。最终，日本通过所谓的“平等条约”，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国家地位，这种地位的改变是通过国际法上对于中日两国独立主权国家平等地位的认可来替代华夷朝贡体系中的不平等。使日本拥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样也成为朝鲜的“上国”，这为其日后入侵朝鲜做了“名分”上的准备。

但是，日本国内对此并不满意，未等批准互换，就要求修约，中方以日本此举违背国际定例，拒绝与日方议约。数年之后日本又操纵琉球，意图使琉球脱离清朝藩属并以此为借口再次向中方要求修约。中国采取延宕策略，致使“球案”和修约都不了了之。此举使日方一致认为必须对中国开战，才能一举解决球案并获得自己满意的条约。等到《中日修好条规》的通商章程期满十年，日本再次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但日方的修约重点全是对中国不公平的条款，违反《中日修好条规》互惠、对等的精神，中方自然不会同意。在 10 余年的漫长交涉过程，日本认识到不能通过外交方式压制中国，便开始加紧准备对中国作战。最终于 1894 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通过战争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实现了所有外交及通商特权，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彻底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

由此可见，1871 年的中日立约，绝不是自主缔结的平等条约，而是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出现近代侵略与压迫关系的开端。此次立约奠定了未来十几年中日关系的主基调，并为最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此次立约不仅在天津举行，更将天津设为通商口岸，自此天津人民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此时开始记述更能完整、直观展现天津人民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全过程。

三、《天津抗日战争志》下限的确定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伯茨坦公告》被认为是抗日战争的结束，但中国战区真正结束是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投降。因此《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实施方案》将下限定为 1945 年 9 月 3 日。此时虽然军事斗争已经结束，但整个战争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仍未结束，很多战争遗留问题还没解决。其中包括：领土争议问题、屠杀惨案受害问题、战俘劳工问题、妇女受害问题、化学（细菌）武器受害问题、私人财产损失问题、被劫文物图书归还问题、日本残留公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作为战争的延续，理应被记录，以保持整个事件的完整性。《天津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中将下限定为 1964 年 11 月最后一批在日殉难劳工骨灰运抵天津并安葬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中国和战败国日本理应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状态，解决战争赔偿等问题，缔结和平条约，从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国共内战持续 4 年之久，曾经执掌中国政权的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

[1]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 页。

1949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在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于 1951 年 9 月 4 日，与包括日本在内的 48 个国家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但实际参与签字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根本没有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显然这是一次非法会议。此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 但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操纵下不顾中国反对，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日台和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给中日关系设置了巨大的障碍。直到 1972 年中日建交，日方认为“日台和约”代表中日战争状态结束，而中方认为邦交正常化才是结束战争状态的必要条件。最终，双方以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一措辞解决中日战争关系结束问题。因此，在法理上中国与日本的战争状态是在中日建交后才真正结束。

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未能实现，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无法通过正常国际途径来解决。在日中国劳工遗骨问题也只能通过民间外交形式来实现。从 1950 年起，以东京华侨总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就一直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归还中国劳工遗骨。1953 年 4 月 1 日，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追悼执行委员会”）为悼念从花冈矿山、小坂矿山、岐阜县等收集到的 551 具劳工遗骨，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了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大法会。同年 6 月，追悼执行委员会向外务省递交了《关于送还中国人殉难者遗骨的请愿书》以期早日实现送还劳工遗骨。日本政府顾忌台湾当局的干预，在认可华侨归国与劳工遗骨送还的同时，唯独不接受日方护送团的乘船要求。经过在日侨民归国团体和日本民间团体共同努力下，日本政府最终同意由日本红十字会遣船送还中国劳工遗骨。在 1953 年 7 月 2 日载有 560 具中国劳工遗骨的“黑潮丸”轮船由神户港起航，于 7 月 7 日抵达天津塘沽港。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到港口迎接骨灰。此后，从 1953 年 8 月 26 日至 1958 年 4 月 15 日，中国劳工遗骨先后分 7 次由日本运抵天津。此后中日关系降到冰点，劳工遗骨送还一度中断。直到 6 年后的 1964 年 11 月 19 日，最后一批在日殉难中国劳工遗骨才送回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民间组织和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做了大量工作，展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遗骨最初安置在天津郊外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1973 年，该馆迁移到水上公园。2006 年，“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至今完好保存着劳工们的遗骨。抗日劳工殉难者遗骨从第一次归还到最终安葬都是在天津进行，因此，将 1964 年 11 月 19 日定为《天津抗日战争志》时间下限。

《天津抗日战争志》将起止时间上溯和下延，可以使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抗日战争的开始背景及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对军事斗争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志书主要记述时限仍为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即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主要记述时限以外内容主要在总述和大事记中反映。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2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第 37 页。

关于打造区级“精品年鉴”的几点思考

王宗征

打造“精品年鉴”现已被各级档案及方志部门提到重要日程，并得到关注和重视。是新时代对于年鉴编纂工作的新要求、新课题和新任务。打造“精品年鉴”，给年鉴编纂工作者提出了新挑战，也带来了提升年鉴编纂质量的新机遇，可谓责任重要，使命光荣。笔者结合年鉴编纂工作实际，就打造区级“精品年鉴”问题谈几点粗浅的想法，以供参考。

一、精准编纂定位

按照“一年一鉴”要求，编纂区级年鉴成为区级档案及方志部门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区级年鉴，通常是综合性年鉴，是上年度所在区级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举措、成果、经验以及教训集大成之作，是对年度区情“百科全书”式的综合反映，可谓纵横兼顾，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是透视区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脉络和特点的地情书。编纂区级年鉴要树立“全区”观念，以全区的视角，全景式立体地审视和统揽区级年鉴的编纂工作，既要把握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既要反映常规性和常态化工作，又要展现年度工作的亮点；既要深入细致地记述区直部门和单位的工作，又要把镇街工作写实写透，不仅总结成绩和经验，还要适度反映失误和教训，切实遵循编纂规律，体现鲜明特点，使年鉴编纂与区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样，年鉴编纂定位才准确，方向才明确，思路才清晰，选材才精准，主题才深刻，立意才深远，所编纂的年鉴含金量才足，质量才高，其资政、存史、教化、育人作用才会有效发挥，打造区级“精品年鉴”才有可能实现。

二、增强精品意识

打造区级“精品年鉴”，必须树立和增强“精品意识”，围绕争创“精品年鉴”，思考和谋划年鉴编纂工作。要创新工作思路，跳出就年鉴编年鉴的单向思维，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着眼，从建构新时代年鉴文化的高度着手，深入审视年鉴编纂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制定年鉴编纂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打造“精品年鉴”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厘清年鉴编纂的思路、步骤、方式方法，以创“精品”思维统领和驾驭年鉴编纂工作。从年鉴编纂定位、第一手材料征集、编纂工作保障机制、专业人才支撑、书稿统筹和编写、书稿审定把关，以及出版社选择、印刷质量保障等多方面强化精品意识，切实按照打造“精品年鉴”的总体构想，做到环环紧扣，步步衔接缜密，精益求精、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工作，力出精品。打造区级“精品年鉴”，要着力解决“精品意识”不强的问题，要强化思想认识的提高，把年鉴编纂工作摆到“争创精品”的重要位置，真正把精品意识融入年鉴编纂工作中，并得到充分体现，为打造区级“精品年

鉴”夯实思想基础。

三、提升驾驭能力

打造区级“精品年鉴”，关键在人才，要提升年鉴编纂专业人才的驾驭能力。做好区级“精品年鉴”创建工作，直接或间接从事年鉴编纂工作的专业人才不可缺少，专业人才能力要与打造“精品年鉴”相契合。要切实提高年鉴编纂人才对年鉴编纂的统筹、规划、基础材料征集和年鉴书稿编纂集成等方面的能力，严格按照“精品年鉴”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标准，培养和锤炼年鉴编纂人员的驾驭能力，使其以过硬的能力和本领，做好年鉴编纂工作。否则，工作本领滞后，驾驭能力不强，再加上精品意识淡薄，打造“精品年鉴”就会流于口号。因此，打造区级“精品年鉴”，要着力解决年鉴编纂工作人员能力不足、本领不硬的问题，要从提升年鉴编纂人员专业能力和水平入手，扎实做好相关人员的能力培养和提高工作，增强驾驭能力，以胜任年鉴编纂工作，为打造区级“精品年鉴”提供强有力的能力和本领支撑。要把区级“精品年鉴”创建工程落在实处，就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引导、督促和帮助编纂人员提升驾驭能力，使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及原则把关能力、材料征集能力、文稿统筹能力、文字把握能力、图文设计能力等都得到相应的综合提升，练就过硬的“金刚钻”，干好编纂“精品年鉴”工作这项“瓷器活”，把打造区级“精品年鉴”的构想和计划变成现实。鉴于此，区级档案和地方志机构，要特别重视年鉴编纂专业人才的选任和培养，发现有潜力、有能力、德才兼备、热爱编纂工作的好苗子，加以重点培养、扶持和使用，尤其要重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年鉴编纂专业人才培养，多给他们压担子，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刻苦摸索、勤奋学习、加强锻炼、增长才干，使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结构优化与区级“精品年鉴”创建工作同步合拍，达到有机统一，让那些专业人才成为从事和引领年鉴编纂工作的主角，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

四、优化基础材料

编纂一部区级年鉴，离不开区直部门和单位以及镇街的基础年鉴材料的提供，而“精品年鉴”更需要有优质的基础年鉴材料做支撑，年鉴书稿的统筹和编辑才会得心顺手，其质量才会有充分的保障。区级档案和地方志机构，要加强对基层基础年鉴材料编写单位和相关人员的指导和督促，注重对区级年鉴第一手材料编写人员的专业培训和针对性更强的具体指导，充分认识写好年鉴第一手材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年鉴编纂专业人员要以问题为导向，从帮助基层解决年鉴基础资料编写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深入基层，调研和了解基础性年鉴材料的编写动态、流程、进展情况等。与基层单位初始材料编写的同志一起研究，破解疑难问题，同时加强日常交流与沟通，保持经常性联系，使通联通气工作常态化，及时提供有效指导和帮助。区级档案和地方志机构及时掌握情况，起到把关定向作用，有利于提高年鉴材料内容及结构的优化，为打造“精品年鉴”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材料支撑。区级档案和方志管理部门要针对年鉴基础材料编写和报送，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对精心编写并及时提供高质量材料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对不认

（下转第 53 页）

三条石——中国手工作坊迈向近代工业的缩影

史宇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官办工业北方中心，地处三岔河口的三条石地区逐渐萌芽了近代民族工业。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里已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机械制造及铸铁业的中心地区，是天津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民族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典型代表，享有“华北地区民族工业摇篮”之称，在天津近代工业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三条石兴衰史，折射出天津工业文明与城市历史变迁的宝贵历史进程，是天津城市的魅力所在、特色所在。

一、三条石区位和名称的由来

“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三岔口是天津子牙河、南运河汇入海河的三角地带，早年这里是烧砖挖土形成的窑洼，水洼被填平后，形成一条条巷。三条石位置居中，由南运河、北运河及河北大街环绕，既靠近海河，又与南、北运河为邻，占地面积约 730 亩，水陆交通便利，自古商贾云集，成为南北漕运的枢纽。

三条石地区位置示意图

在三岔河口的东北，有一条东南走向的街道与河北大街相交，这条街道就是三条石大街。据传当年这里每天车水马龙，为方便行车，在路面上铺设了三条并排的青石。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当年的直隶总督衙门在这条街道的东南，为方便走仪仗队，李鸿章特地叫人铺上三条并排的青石，由此得名三条石大街。

二、天津三条石地区机器铸造业发展历程

（一）萌芽期（1860—1900 年）

19 世纪 60 年代，具有铸铁手工业传统的交河、献县一带有手艺的农民，受城市市场的吸引，农闲时带上简单工具来到三条石地区，为船家修理船具。1860 年，三条石地区诞生了第一家固定的铸铁作坊——“秦记”铁铺，它是被誉为“铸造之乡”的河北交河农民秦玉清开设的。“秦记”铁铺是三条石地区的第一家作坊，而且也是当时天津仅有的铸锅工场。它的出现在三条石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拉开了三条石地区民族铸铁业兴起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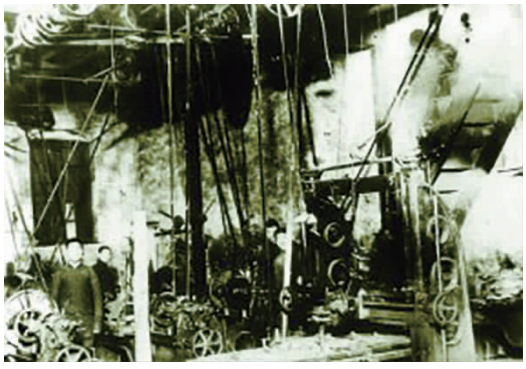
（二）发展期（1900—1914 年）

天津开埠后，三条石地区的手工作坊开始承接租界的建筑设施制作，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铸造业来看：1914 年前已建成金聚成、三合、三义永、永茂公、双聚公、华顺生、亨利等 7 家。例如，金聚成拥有工人 39 人，建有化铁炉等设备。从机器工业看：建成有郭天成、郭天祥、春发泰等 3 家。例如，郭天成机器厂，1905 年开始给日本田村洋行作轧花机、织布机的加工活，后来开始自造织布机销售，常年雇佣 70 多名工人，有 10 多台机床。

福聚兴机器厂旧址

（三）黄金期（1914—1937 年）

随着近代天津作为北方最大工业城市的形成，三条石地区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最初的加工配套生产逐渐分为：铸铁业和铸造业。



1918 年，郭天成创办的机器厂车间内景

20 世纪 30 年代，三条石大街已成为一条独具规模的“铁厂街”。据当时大公报记载：“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大小铁工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竟然集中了 80 余家。”1929 年，天津有 62 家机器制造厂，设在三条石大街及其附近的就有 22 家。1937 年，三条石地区已拥有 300 家工厂和手工作坊，达到鼎盛。仅三条石大街就有铸铁厂 36 家，机器制造厂 71 家，分厂、分号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品不但销售至华北各地，有的产品还远销到南洋群岛。例如，当时很有名气的郭天祥机器厂曾经在山东济南和河南安阳建立分号扩大经营。德利兴机器厂一度在全国兴办了六七家分厂，让三条石生产的产品走向了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

（四）衰落期（1937—194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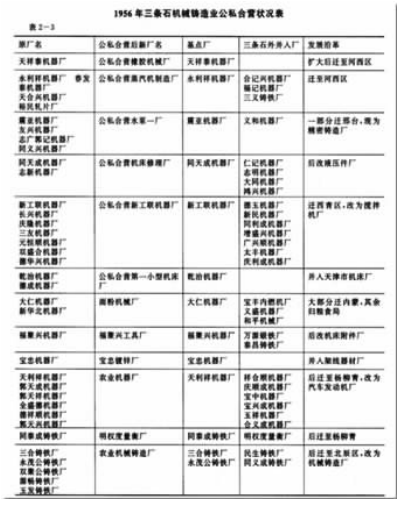
日伪占领时期，天津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很多企业工厂被强行接管，被迫为日本侵略者生产军工用品，其他企业受原料供应限制和战时统购统销影响只能歇业停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三条石地区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极度衰退，奄奄一息。

（五）振兴期（1949—1956 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三条石地区的工业振兴十分重视。1956 年公私合营后，政府投入资金对工厂进行技术革新改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工人从过去的雇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三、推动三条石地区机器铸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条石地区之所以成为天津机器铸造业发祥地，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更得益于自 1860 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规定，天津成为北方最早的 3 个通商口岸之一，并逐渐成为近代史上与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撞击、融合最广泛、最前沿的城市之一，直接促成天津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在规模上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工业城



1956 年三条石机器铸造业公私合营情况表

市。工业化、城市化、港口贸易等外部因素的快速发展，为三条石机器铸造业带来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先进管理制度、劳动力和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使得三条石地区在近代天津工业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地处交通要冲和经济中心，自古商业贸易发达

天津具有得天独厚的河海交通优势，内联华北腹地，外通五湖四海，历史上是南北、内外货物交流的商贸城市。三条石地区靠近南、北运河汇流处的三岔河口，隋唐以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由于华北农业生产较为落后，便需要漕运从南方走水道，运输大批粮食以维持运转。无论海漕或河漕，货船必经三岔河口地区转运。漕船在此停留数月，于是大批饭馆、车马店、杂货店等在这一带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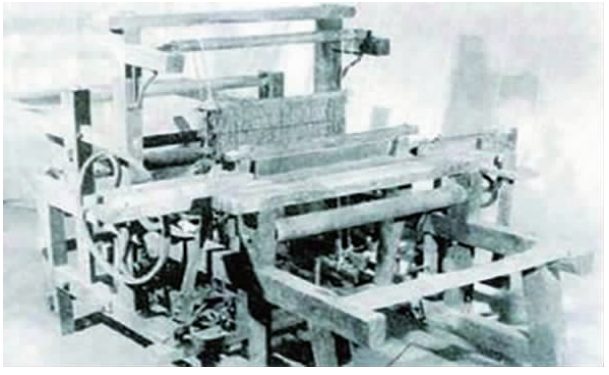
到清代中期，海禁有所缓和，便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北洋航线。天津成为南北物产交汇之所，随着与江、浙、闽、粤以及东北、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天津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的作用一天天明显起来。当时的三岔河口船舶往来、陆上车马杂沓、街旁店铺林立、市中熙熙攘攘。《津门杂记》中记载：“繁华热闹胜两广，河路码头买卖广。”城乡商贾、手工业者多聚集于此，使这一地区成为城乡物资的集散地，特别是南、北运河往来船只所需的各种铁制器件多半要在这里更换，为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

河北大街处在城乡接合部，各种铁制的农具和生活器具销售旺盛，所以一些农村铁匠为了多赚些钱，便聚集在三条石大街。他们从这里经过水路，可以把华北地区的生、熟铁原料方便地运进来；打制出来的各种铁器，又可以就近拿到河北大街去出售。以前这里是季节性的铁业，即农闲时用小车推着模子、铁炉等工具来这里打铁，农忙时回家务农，当时叫“打行炉”。后来，由于各种铁器销量日见增加，19世纪中叶以后，来这里开业的铁铺愈来愈多，逐渐形成规模，这也是三条石铸铁机器制造业的雏形。

（二）近代天津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发展为三条石地区提供强大支撑

1. 近代工业发展为三条石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人才和先进管理理念

先进的技术设备：天津的近代工业发端于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以自强”思想指导下，于1866年始建的天津机器局。1870年冬，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对机器局进行整顿扩充，规模迅速扩大，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天津机器局对天津近代工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天津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机器局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把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带入天津，如木模翻砂的铸铁工艺便是其中之一。原来这项工艺只有外国工匠掌握，后来中国工匠也学会了这门技术，并开始流入到三条石。与此同时，西洋传来的手摇羊皮风葫芦，因进风量大，很快便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木制风箱，后来又换用了电动鼓风机。技术和工艺的革新，不但使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改善，而且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三条石机器工厂生产的织布机，质量上乘，深受欢迎

人才：机器局采购很多国外设备，技术水平较高，因而在生产过程中聘用很多外国技术人员，培养和训练本国技术员工，对工人进行业务指导，他们成为北方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的骨干。1870 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天津机器局裁汰了一批工匠。这些工匠受近代工业文明的熏陶，技术水平高超，来到三条石很快成为各工厂作坊的骨干力量，极大促进了三条石机器铸造业快速发展。

先进管理理念：三条石最初都是“资本少、规模小”的中小型工厂，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受近代工业管理体系的影响，再结合本土特点，形成一套独特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办法。一是很多工厂主开始接受现代经营理念，通过传媒或其他手段做广告，介绍和宣传自己的产品，以扩大销售，三条石很多机器厂在自己的厂门口竖立起旋转广告牌，让客户能够看到企业的介绍；在当时的一些报纸上，经常可以看见三条石地区铸铁厂和机器厂的产品广告。二是学习西方列强在华企业管理经验，引入“经理人”制，优化管理层级，提高生产效率；采取股份制，激发雇工生产热情。三是很多工厂还聘用律师作法律顾问，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以维护本厂的经济利益。

政府颁发给全盛德机器厂的营业执照

2. “新政”和后期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为三条石地区的发展带来资金支持

20 世纪初的“新政”时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从限制商人投资创办近代企业变为鼓励保护近代私人企业的发展，大大放松了国家对商人经济活动的直接限制与干预，清政府在中央和省级设立专门管理工商业和教育事务的机构，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兴办工商业，对兴办工商业予以倡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提倡发展实业，而随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扩大自身实力增加财政收入，也为了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先后制定一系列鼓励振兴实业的章程和条例。如《奖励工艺品章程》《公司保息条例》《商令法》《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等法令，天津地方政府也顺应这种形势，制定了很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在这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很多富商巨贾和士绅官员纷纷将资金投入三条石地区的作坊工厂，解决了工厂融资再发展、再生产难题。

“新政”时期，袁世凯在天津修建的劝业场所，积极鼓励发展实业

3. 传统自然经济被近代工业冲击瓦解，为三条石地区带来充裕劳动力

天津开埠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侵略，导致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加深。《马关条约》和庚子赔款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欠下大量外债。清政府为了偿还外债，对内大量加税，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天津附近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纷纷破产，农村剩余人口大量流向城市。20 世纪初，天津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交通便捷、商业繁荣，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纷纷流入城市，贫困的灾民和农民更是大量涌入天津。据天津巡警局调查，1903 至 1906 年，从附近几省来津的季节工约 3 万到 4 万人。开始是季节性的打工，以后逐步转变为全家来津定居。

三条石地区的机械铸造工厂作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4.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港口贸易的兴旺，为三条石地区机器铸造业带来旺盛市场需求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市场需求：随着天津逐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河北新区建设进一步扩大城区面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1840 年前后，天津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 9.4 平方公里，1934 年已经达到 54.8 平方公里，扩大了 5 倍。1840 年天津城市人口不足 20 万人，1906 年天津城区人口已达到 42 万余人，1936 年城区人口猛增到 125 万余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居全国第 3 位。

伴随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天津的交通、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突飞猛进。截至 1910 年，天津修建了六座钢铁大桥取代了原来的浮桥；1906 年建成当时最大的比利时电车电灯公司；1903 年建成济安自来水公司；1906 年比利时电车电灯公司开设有轨电车，使天津成为中国城市中最早拥有近代公共交通的城市；1901 年拆除旧城墙，建设环城公路，到 1914 年形成了网状城区道路格局。城市建设的发展，拉动大批铸铁制品的需求，如：楼房使用的上、下水管道、暖气片或取暖用炉；街道两旁用的泄水篦子、路灯底座等等。市场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三条石的工厂作坊积极投资扩大规模，提升产量。

1937 年，热闹繁华的天津城区街头

港口贸易繁荣带来的市场需求：进入 20 世纪，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加，天津港对棉花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进而成为北方棉花出口的最大口岸。1912 至 1933 年间，天津港输往国际市场的棉花，在半数以上的年份里都占到了全国棉花出口总额的 50 %以上，1932 年则高达 93.2%。许多棉花商在天津建立了打包厂，三条石的工厂为其提供棉花打包机；还有一些棉花商将棉花出手后，又把三条石生产的织布机，通过水陆贩卖到华北各地，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三条石的铸造业和机械制造业的日渐繁荣。

四、三条石的发展历程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三条石的打铁声已经远去，回顾三条石发展历程，三条石地区的民族工业能够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仍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一）平稳的政治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条石地区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帝国主义列强放松了对中

国的侵略和掠夺，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牵制了他们对外侵略掠夺的精力，天津的民族工商业迎来发展机遇期，三条石地区较大规模的工厂均是在此期间投资兴建的。随后天津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硝烟导致很多企业濒于破产，尽管有些企业顽强经营，存活下来，但也是苦苦支撑。所以，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体与外部环境联系十分紧密。

当今国内很多企业都在筹划“走出去”战略，选择政局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是首要因素。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节省财务费用，在境外投资建厂时会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各项成本高，转而把目光投向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往往政局不稳，一旦发生动乱，投资将血本无归。

（二）区位优势对企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条石地区的辉煌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地理位置。三条石地区地处三岔河口，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如果没有后来的天津开埠，也仅仅是一些手工作坊的聚集地。随着天津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和北方商业中心，三条石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尽得天津发展红利，很快就壮大起来。工业发展与地理位置关系紧密，必须坚持贴近市场、贴近资源、贴近劳动力丰富区、贴近技术等多方面原则。

（三）及时跟踪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进入古老中国，原有的手工作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三条石地区的手工作坊主并没有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而是积极吸纳学习在华企业的先进技术，采购新设备，引进专业人才，“洋为中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被三条石地区的工厂主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验证，工艺水平也很成熟，可以拿来直接使用，所有的研发、调试、磨合等过程中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高水平是财富，低水平是包袱”，从三条石地区的发展来看，企业只有果断摒弃落后技术，不断了解掌握最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加大技术革新改造，努力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国内曾经最大的显像管生产企业，在液晶显示器已经悄然进入市场时，却盲目斥巨资再引入两条显像管生产线，希望能进一步稳固现有市场地位，但项目尚未投产，液晶电视已经走入千家万户，显像管电视被市场无情抛弃，该企业背负重重债务，最后只能破产。

（四）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工商业提倡奖励和保护，改变了商人几千年来受人鄙夷地位低下的局面，由士农工商的末位一跃而升至首位。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使得官绅等也纷纷投资于近代工业。这段时期也是三条石工厂作坊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优良的营商环境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微观经济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有利于把企业发展动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近年来，天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作了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在打造营商环境力度上，特别是政府帮扶企业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优秀企业汇聚海河岸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投资力度，携手谱写天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规划部）

杨轶伦与冷枫诗社

侯福志

杨轶伦，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属龙。其父杨开智，字睿芝，邑庠生，毕业于北洋大学，曾担任武清县人民代表。开智生二子、一女，长子轶伦（名鸿飞，以字行）、次子轶群（名鸿翔，一名平，以字行），女儿艺兰。

杨轶伦是诗词大家，早年师从著名学者、教育家、藏石家张轮远（今武清区王庆坨镇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杨轶伦曾先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私立含光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是“服务于教育界最久之教师”，因为他经验丰富，教法得当，态度和蔼，故在师生中威望颇高。1936 年 12 月，他和张异荪、王禹人等诸师友一起发起成立了“冷枫诗社”。20 世纪 40 年代与牛竹溪等人创立“河北文艺社”。1943 年加入“玉澜词社”。1946 年，他加入了著名的“梦碧词社”，与诗词大家寇梦碧结为诗友。当时，该社成员有 40 余人，其中包括李琴湘、姚灵犀、周汝昌、刘云孙等名家在内。1947 年 9 月，他还发起成立了“丽则诗词研究社”，社址位于一区（今属和平区）昆明路通义学校分校，专门讲授诗词创作。他自 1926 年开始创作诗词，有《自怡悦斋诗稿》（油印本）存世。著名学者、书法家李琴湘曾在《自怡悦斋诗稿·序》一文中这样评价杨轶伦：“杨君雄于文，授徒课士十余年，辗转移帐于津、武两邑城市间，弦歌不辍。所到之处，均有诗社之刱立，讲坛余韵，沾溉已多，郁然有邴原（东汉学者）之遗风焉！此尤余所殷殷企望者矣。”

杨轶伦曾主编《文叶》杂志。《文叶》是一家文艺周刊，16 开本，每期 8 页，创办于 1947 年 9 月 20 日，社址在天津市一区河北路 140 号。发行人刘秉中，主编则是杨轶伦。关于该周刊的创办背景，谢溶音在《创刊词》、刘秉中在《文化界的哀痛》（试刊号第 2 期）这两篇文字中作了诠释。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战火弥漫下的北国，文化界为“近年来最饥荒的时期”，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些黄色刊物“则雨后春笋般的充斥在市面上”“一般渴望得到真正食粮的人，悄然避开，而大多数读者都人手一册画报，以消磨其有用的时间”“换言之，亦即大众得不到正确的食粮”。对于文化界而言，这种反常的现象，无异于一种自戕行为。创办《文叶》就是“希望利用这一片小小的叶子，给青年们作一个伴侣；前进的途上，也许有无边的沙漠，一枚青青的叶子，会给你一点安慰、鼓励和憧憬！”

《文叶》的初衷除希望引导青年成长的理

想外，还希望能够在未来发达以后承担另外两种社会义务：一是“扶助优秀作家的出版事业”；二是资助清贫学子就学。据刘秉中《文叶的远景》一文载，《文叶》是由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创办的，“他们聚集个人日常节余的金钱作资本，并且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培植起来的。这本小刊物虽然是寥寥数页，但为了培植它，社内的同人，有的整日忘掉了吃饭，有的整夜失眠，有的跑酸了腿到各处去送报，而在这叶子诞生的时候，真使他们发了狂”。之所以取名“文叶”，杨轶伦在《叶与文叶》一文作如下解释：“按文艺来说，黄色报纸，好比是花，花的香气太浓郁，好像一个浓妆艳裹，涂脂抹粉的美妇；而纯文艺的刊物，则不妨说是叶，叶则素净天然，使人坐对终日，悠然意远，可以做耐久朋，能够当素心友。因此我们这一个小小刊物，就以‘叶’为名了。”

《文叶》分为杂文、文艺、青年生活、学生园地等栏目，另设有长篇小说连载。杨轶伦在《文叶》发表了多篇随笔。其思想之敏锐，语言之精熟，笔法之老到，非他人能比。如《小楼一角》《剪影》，构思精巧，文笔细腻。另刊有给青年学生的励志诗，至今读来亦满口生香，如在《助青年》组诗中，多有格言警句，读来朗朗上口。如“其二”云：“积少成多功日累，勿因善小而不为。”“其三”云：“要把光阴惜寸分，自强不息日精勤。更须五育同时重，德智还兼体美群。”“热诚服务会殷殷，作事当如童子军。献此身心献此力，劝君造幸为人群。”杨轶伦不仅创作诗歌，还精于写诗理论。如在《漫谈剪景》中，要求写诗一定要善于剪裁。他认为，一味地“不分美恶，有什么说什么，一定不会产生好的作品”。杨轶伦举例说，他每每欣赏古人田园诗作，便心驰神往。可是，当到郊外实际一走，发现村庄里净是猪圈、粪坑，臭气熏蒸，污秽满地。这时就会对诗人产生疑问：难道诗人惯作欺人之谈吗？当然不是。实际上，诗人并没有说瞎话，田园里的确是有可以留恋的地方，诗人们把美好的风景加以吟咏，而把不好的略去不写，这种写诗的方法叫剪裁。因为杨轶伦是含光女中的国文老师，又是一位文艺主编，因此，他很注重利用《文叶》这块园地培养自己的学生。如史振荣的《一学期开始》、朱庆远的《我升入中学以后的感想》，都是经他推荐后发表的。虽然这些作品手法稚嫩，但思想活泼，感情真挚，语言明快，字里行间凝结了作者的心血。《文叶》仅出版 3 期试刊号，由于当局“不予购纸外汇”，造成“纸张杜绝来源”，故使其“中途夭折”。

冷枫诗社成立于 1936 年 12 月，相较于 1921 年成立之城南诗社，虽然时间较晚，但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影响力并不亚于城南诗社，今之人只知城南诗社而不晓冷枫诗社者不在少数，实为憾事。

冷枫诗社发起人为杨轶伦、张异荪、王禹人诸人。其中尤以杨轶伦贡献最大。以成立时正值秋季，取唐朝诗人崔明信之“枫落吴江冷”之句得名。初创时，采取社友轮流值课（即出题征诗、征诗钟）方式，其后以社友日多，乃于 1938 年秋季始，公聘赵幼梅（元礼）为导师，1939 年赵幼梅去世后，乃另

聘高彤皆（凌雯）、李择庐（琴湘）二耆宿为祭酒。最高峰时，冷枫诗社共有社友 30 余人，刘云孙、胡峻门、郑菊如、李一菴、徐镜波等津门诗坛名流皆为社员。自 1941 年夏季开始，诗社举办有奖征集活动，一时四方俊彦争以佳作相投，颇极一时之盛。

关于冷枫诗社之缘起，1937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24 日，天津出版的《大中时报》分四期连载了杨轶伦的长文——《吟余杂缀——冷枫诗社成立始末》作了披露。

据载，1934 年暑假后，杨轶伦就职于位于老西开附近的若瑟女子学校。第二年，杨轶伦的老友高守吾亦来该校任职，“当年旧雨，此日同人，谈艺论道，颇不寂寞，有时此唱彼和，尤觉兴复不浅，而组织冷枫社之动机，亦肇始于此时矣”。1936 年秋季，杨轶伦与高守吾谈及组织诗社之事，得到高守吾首肯，并表示愿竭力促成。杨轶伦复往老友、著名教育家吴杰民（衰柳）处接洽，吴杰民亦极愿加入。

张异荪时为城南诗社社友，亦为津沽名诗人。1933 年，蒙王焕如先生介绍，杨轶伦与张异荪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杨轶伦商请张异荪结社之事，亦得到张异荪的支持。“既与（高）守吾、（张）异荪约定，数日后，复至河北访（王）禹人，请伊赞助，禹人亦首肯。”“忆自犀灵社，而河北文艺社，至是予（杨轶伦）与禹人已为三度之同社友矣。笔墨缘深，殊令人溯当年不置也。”此外，旧友石田成立诗社亦表示赞同，复承若瑟女校同人于君“慨然以寓处相假，俾便充作社址，而予等六人，遂作冷枫社之发起人，开始筹备一切矣”。

发起人既经确定，杨轶伦遂与同人等讨论诗社名称，几经研究，并无统一意见。有一天，杨轶伦到高守吾处谈及此事，“时正深秋，冷风凄切，使人悲从中来，不能自已”。杨轶伦之女弟子高蕙裳，乃为高守吾之长女，性颇颖悟，适亦在座，“戏谓予（指杨轶伦）曰：诗社命名，宜切合成立之时令，此刻秋风正冷，景物萧瑟，盖以‘冷风’命名乎？予不觉跃然而起曰，‘冷风’二字，殊嫌不文，古人有‘枫落吴江冷’之句，命名‘冷枫’，或较为典雅而复切结社之时令”。“冷枫”遂被确定为社名。

社名确定之后，诸位发起人于 1936 年 12 月 6 日下午，借老西开教堂后瑞德新里五号召开了成立大会，在会上，王禹人题赠“香山红叶”（镶之镜框）留念，张异荪作《赋冷枫诗社成立》七律三章以柬诸社友，其中有诗句云：“冷枫结社初成日，恰是吴江木落时。老圃黄花开晚节，御沟红叶写新诗。”诗社同仁各依原韵奉和，以答雅意。唱和者计有 9 人，共得诗 14 首，“汇钞一册，作为纪念”。

1937 年 1 月 24 日，冷枫诗社于燕春坊饭庄举行第一次会课，参加社友占全体社员的三分之二。自此之后，诗社每月组织会课一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4 年 4 月。后因抗战进入白热化，时局不靖，加之冷枫诗社人员星散，大概在 1945 年前后诗社停止活动。另据资料载，三年内战时期，杨轶伦、张异荪等冷枫社友之间仍有唱和活动，此当为冷枫诗社之余续矣。

（供稿单位：武清区方志办）

涂宗涛先生学术谈片

宋文彬

一、读书应读常用书

涂宗涛先生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诗词曲格律研究专家、藏书家。我拜识涂先生之时，他已是八十高龄，但精神颇佳。

第一次走进涂先生位于河东区嘉华里的“苹楼”书斋，见壁间悬挂着其业师、古文字专家商承祚先生及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所书的条幅。商先生的楚简条幅书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有“宗涛同志”上款，所书颇精。张舜徽先生的小篆条幅，文人气很浓。因我素喜书法，故印象颇深。

当年，我只有二十几岁，在交谈中，涂先生循循善诱，叮嘱我要多读书，但不要有猎奇之心，要多读常用书，“四书”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圣经”，一定要熟读，最好能够背诵；对于“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要多读几遍，要熟悉，尤其要熟知书中典故，因为后世的诗、词、文中所用很多典故，皆出自“前四史”；《易经》乃群经之首，要熟读。因我对古典诗词有兴趣，涂先生要我熟读《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诗经》中的“雅”“颂”部分，可以只读名篇，但《国风》都应背诵，此外，“杜诗”应精读。对于前人的注本，不要盲从，应有选择，虽说“诗无达诂”，但前人亦有信口开河处。

谈到诗词，涂先生称，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真感情的，而且未必出自名家之手。《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一则故事：“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者动色。”一个小商贩，识不了多少字，却要学写词曲，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写了《哭母》，语句虽显俚俗，但写得十分感人，情真意切，朴实无华，流露出真感情，是好作品。

二、读书先要“识字”

“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涂先生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他是有感而发，“感”的是现今一些古籍整理类书籍低级错误很多。

大概有人会说，这是一句废话，其实不然。何谓“识字”？涂先生认为，认识简化字，不能叫识字，特别是搞传统文化研究的人，经常要接触古代典籍，古书上都是繁体字，所以一定要认识繁体字。那么，认识了繁体字，可以叫“识字”了吗？还不行，要能够认识汉字的真、草、隶、篆四体，才能叫“识字”。

我曾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位退休教授谈到涂先生的这个观点，此公觉得涂先生大言欺人，他问我：“谁的论文是用甲骨文写的？都要认识甲骨文吗？”我则付之一笑。

我以为，涂先生并非大言欺人。要认识繁体字，一般人还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说要认识真、草、隶、篆四体书才能叫“识字”呢？涂先生是针对整理原始文献而言的。搞传统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原始文献，很多原始文献，包括前人的批注，是用行草书书写的，如果整理者不识草字，整理起来会非常困难，而且会出现很多错误。数年前，南开大学文学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以南开自藏的一部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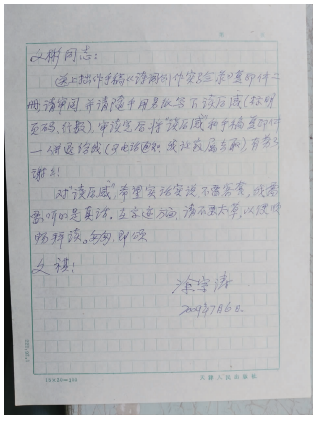
稿本为研究课题，但其不识草字，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请教了很多人，但最后还是出现了不少错误，这是我所亲历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那么，不搞专业研究的人，是不是可以不必识“四体”书呢？我以为，还是认识一些好，否则会闹笑话。一次，我途经大悲禅院附近，看到两名外地游客，其中一人指着本市老一辈书法家龚望先生所书的隶书横额“同登彼岸”，念道：“同登波岸。”这便是不识隶书双人旁的写法之故。

三、今音古音之别

涂宗涛先生曾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记名弟子钟稚据先生，故此，于声韵、文字、训诂之学，颇有传承，曾主持整理、修订复旦大学教授郑权中的遗稿《通借字萃编》，此书曾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

向涂先生问学，经常可以听到他讲一些声韵方面的知识，如：今音读轻唇音，中古音皆读重唇音，例如著名学者吴宓的“宓”（f ú）字，今音读轻唇音，但中古音读作（m ì），是重唇音；又如，舌音分为舌头音和舌上音，今音读舌上音的，中古音皆读舌头音，涂先生说，一次，他和朋友到外地的一座寺庙参观，遇到一位法师，询问对方的法号，对方自称妙澄（d è ng），朋友们皆不解（d è ng）是哪个字，涂先生向大家解释，（d è ng）即澄（ch é ng）字，法师读的是古音，（d è ng）是舌头音，今人读（ch é ng）是舌上音。



涂先生写给笔者的书信

一次，我和涂先生聊到《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文中说项羽“力能扛鼎”，我说，以前只知道“扛”字读“k á ng”，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扛”，音江，原来“扛”字在这里读“ji ā ng”。涂先生马上纠正道，“扛”字在这里应该读“g ā ng”，因为“江”是“见”纽（声母）的字，声母应为“g”，古音应读“g ā ng”，以肩承物，读“k á ng”，两手对举重物，读“g ā ng”。另外，“江”字的古音也读“g ā ng”。

四、工具书的使用

涂宗涛先生精于目录学，其所著《常用文史工具书简目》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文史类工具书。

我曾向涂先生请教哪种古汉语字典最好，他推荐的是《王力古汉语字典》，因为这部字典有同义字的辨析。如“洗”“盥”“沐”“浴”“沫”“洒”皆有“洗”的意思，如何分别呢？编者引《论衡·讥日》中语：“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形垢。”也就是说，“沐”是指洗头，“洗”是指洗脚，“盥”是指洗手，“浴”是指洗身体。此外，注明“沫”是洗面，“洗涤”的意义本写作“洒”（先礼切），后来，“洗”的词义扩大，由“洗足”变为一般的“洗涤”，就代替了“洒”，而“洒”多用于“洒水”之义（读所卖切）。解释得非常清楚。

涂先生还举例说明历表的重要性。如历史记载洪秀全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查年表可知，清嘉庆十八年是公元 1813 年，但通过核对历表，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已是 1814 年的 1 月 1 日了，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年表来判断洪秀全生于 1813 年。

此外，涂先生还教我如何使用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并告知此书推算的西汉太初以前一段时期的朔闰有误，应以《文物》1974 年第三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中所

列《汉高祖元年（前 206）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 105 年）朔闰表》为准。

五、自述学诗经历

涂宗涛先生是诗词曲格律研究专家，曾谈起他的学诗经历。他生在四川省巴县园明乡的偏僻农村，父亲为半文盲农民，毫无家学可言，涂先生学诗完全靠自学。第一次接触古典诗词，是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偶然在堂兄处见到一本《千家诗》，随手翻阅，读到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时，尽管不能理解最后一句的含义，但一下子就被这首诗迷住了，觉得前三句写得太美了，当时便能背诵。升入初中后，选读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中的部分作品，且大多能背诵。初步学会写旧体诗，是在重庆市立高中上学期间，扩大阅读范围，先后选读了《古唐诗合解》《湖海诗传》《古诗源》《李后主词》中的部分作品，通读了《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中国诗学通论》等谈论诗学的著作，还阅读了三本讲诗词格律的书，即《诗学常识》《诗法通微》《白香词谱》。涂先生读书有一个好习惯，就是随手作札记。

高中二年级时，一次，语文老师出了“春水绿波的嘉陵江”的作文题，涂先生在作文本上写了一首七律：“嘉陵春水绿波柔，送尽年光日夜流。嫩绿芽抽杨柳岸，微红蓓吐桃花洲。熹晨游艇出溪口，薄暮征帆归渡头。静听空山啼杜宇，顿忘物我两悠悠。”没有想到，语文老师娄博生先生竟在课堂上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这首诗，并表扬了涂先生，使他备受鼓舞。

升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文系后，涂先生通读了《杜诗详注》《声调谱》《随园诗话》《人间词话》《湘绮楼说诗》等书，并和十余名爱好诗词的同学成立了“鸡鸣风雨社”，切磋诗词。

涂先生还谈到一个教训，就是学诗不可有门户之见。如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读书时，著名诗人、学者邵祖平先生给高年级开“诗选”课，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但当时涂先生喜欢“性灵派”和“神韵派”的作品，认为邵先生属于“江西诗派”，诗风“枯淡”，缺乏“韵致”（实为自己浅薄无知），竟然从来不和他联系，错过了受教的良机，追悔莫及。

六、“杂而不精，成就不大”

“杂而不精，成就不大”是涂先生对其治学之路的自我评价。涂先生尝言，其治学之路，从学科而言，文史哲皆有涉猎，其他如声韵、训诂、文字、民俗、目录、版本亦有所涉及，不仅如此，晚年为指导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一名硕士研究生，竟转入《诗经》中的服饰研究，后又由古代服饰延伸到对古乐《霓裳羽衣曲》的研究，并写出两篇学术论文，此“杂”之谓也。

“杂而不精，成就不大”实为涂先生自谦之辞。涂先生治学涉猎面虽“杂”，但皆有专著行世或有论文发表。如：在目录学领域，有《常用文史工具书简目》一书行世，此书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同类书籍的第一本；在“小学”领域，曾主持整理、修订《通借字萃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权中遗稿），此书曾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在藏书（版本学）领域，有《苹楼藏书琐谈》一书行世。此外，在民俗、古代服饰、古乐等领域亦多有论文发表。

涂先生治学亦有“精”处，即在传统诗学领域有系列专著“苹楼诗学三种”：《诗词曲格律纲要》《诗词曲答问》《诗词创作实验录》行世，三书分别涉及传统诗学的格律、释疑、创作三个领域，是成系统的。《诗词曲格律纲要》一书对王力等著名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受到学界认可。涂先生自称“成就不大”，不亦谦乎？

七、文史杂谈

涂先生在米寿之年曾推出其煞尾之作——《文史纵横谈》，收录学术论文及随笔近八十篇，很多文章视角独特，或道破文史疑案，或纠正史学、辞章学、民俗学研究领域的讹误，足资文史研究者参考。

“苏武牧羊”的故事尽人皆知。在戏剧舞台上，从传统京剧《苏武牧羊》（又名《万里缘》）到2008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茂陵封侯》，都歌颂了苏武在匈奴期间的妻子。但遗憾的是，这位匈奴籍女性的生平事迹，除了《汉书·苏武传》中记载她为苏武生了一个儿子苏通国之外，别的一概不知。京剧《苏武牧羊》中称此女为匈奴太尉胡克丹之女胡阿云，《茂陵封侯》中则称此女为单于之女乌琴。涂先生根据《汉书·苏武传》《汉书·匈奴传》等史料相关记载，撰成《苏武之匈奴籍妻初探》一文，指出苏武的匈奴籍妻子绝不会是贵族妇女，极有可能是李陵投降匈奴后所娶之妻（单于之女）身边的婢女（赠给苏武，照料其日常起居，非正妻之名），发前人所未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新中国成立前，老天津卫人尊称别人为“二爷”，通常的解释是：因已婚妇女盼望生儿子，便到天后宫去烧香求子“拴娃娃”。带回家的泥娃娃被称为“娃娃哥”，视为家里的“首生子”，所以自己的“头生子”一律行二，故老天津卫的男子，彼此都称“二爷”，而不称“大爷”。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普遍的民俗是，已婚妇女盼望生儿子，到庙里“送子娘娘”神像前烧香许愿，生了儿子后去烧香还愿就是了，并没有“拴娃娃”和“洗娃娃”（“娃娃哥”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其形象）的习俗，“头生子”就是行大，并不行二。而且，在人际交往中，“兄”是对他人的尊称，“弟”则为自己的谦称，故通常不管别人行几，都敬称之为“大哥”“大爷”，为何老天津卫的男子虽为“头生子”也不能行大呢？涂先生偶读裘锡圭先生《杀首子解》一文后，悟出了老天津话对男子尊称“二爷”而不称“大爷”的文化意蕴。原来，在上古时代，不分中外，人类都有过“杀首子”以“献神”的习俗。《墨子》《列子》等古籍记载，我国上古确曾有过“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的习俗；《圣经》的《出埃及记》中亦有：“你应该把凡是母亲头胎新生的都献给雅赫威（神）”的记载。老天津卫“拴娃娃”和“洗娃娃”的习俗，仍保留了上古“杀首子”的文化意蕴。因“头生子”是要杀了献给神的，而“娃娃哥”为神所赐，可以之代替“头生子”。老天津卫人之所以要“洗娃娃”，使“娃娃哥”伴随其一生，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头生子”，行二，不能杀以献给神，这样一来，当然就“宜弟”了。此文匡正了民俗学研究领域的陈见。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可谓脍炙人口，但词中“吴刚捧出桂花酒”一句中的“桂花酒”一直无人注释，不知是作者因有“吴刚伐桂”的神话传说，才由桂树联想到桂花，又由桂花联想到“桂花酒”这一想象之物，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桂花酒”呢？涂先生根据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撰成《释“桂花酒”》一文，明言确有“桂花酒”，并详细介绍了制作“桂花酒”的方法，为有关学者进一步笺释毛主席诗词提供了依据。

再如，涂先生以民俗的“庆坛”活动来证明《楚辞·九歌》的娱神性、如何看待李白《静夜思》中出现的异文、“苴却砚”之“苴却”作何解等文章皆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学术价值。

涂先生在望九之年曾对我讲，有意将“苹楼诗学”三种：《诗词曲格律纲要》《诗词曲答问》《诗词创作实验录》，修订后重新出版（一函三册），惜未能完成。

（作者单位：天津政法报社）

浅析《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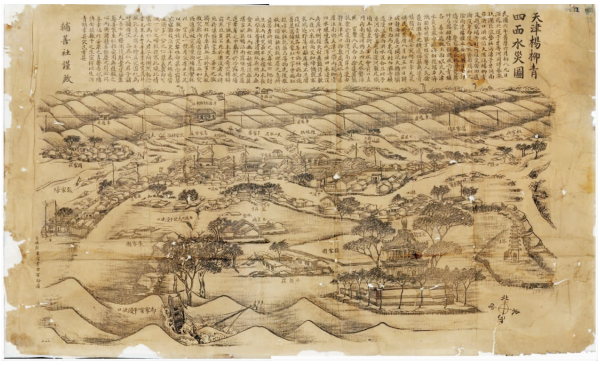
谢连华

杨柳青位于南运河（京杭大运河杨柳青段）两岸、子牙河南岸，两河滋养了杨柳青一方水土和百姓。运输的便利给沿岸市面带来了繁荣，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丰富了百姓生活，但也因河水多，夏秋之际，雨水连绵，洪水暴发，仅靠下游一条海河通道入海，有时因水急量大容纳不下，给百姓造成严重灾难。

民国六年（1917）旧历六月初，北运河及其上游的支流河水猛涨，造成下游沿岸浸溢，今北辰区与红桥区西北部先受灾。随着永定河水漫入杨柳青东淀地区，使海河水位增高。南运河、子牙河下游宣泄不畅，相继与沿岸大堤平漕。天津西部杨柳青在子牙河南、南运河北之间，由于洪水倒流，向西侵入卞家洼，不久又漫入杨柳青至白滩寺大道（今青远路）。人们抢险拦水筑堤，在大道上培土筑高。但子牙河又从上游漫入，围困了当城村、莲花淀（小洼），洪水从铁道涵洞涌出，汇进杨柳青后大道。一时杨柳青镇内低洼地区瞬间成泽国，人们扶老携幼，择高地趋避。而后南运河在镇西的郝咀决口，向天津市及南洼冲去。天津市城厢西南，大水汹涌，漫流向东，汇入海河。此次洪水的状况，由当时杨柳青镇画师受聘辅善社绘制了《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由辅善社（民间公议组成的慈善团体）在上面注释，解说了受灾情况，用石印印制了几千张，发送本镇各殷实商户和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及新疆“赶大营”、白沟河等外地同乡，呼吁救灾募捐。在安离水局（旧时杨柳青十五街一处消防组织）二局前开办粥厂暖棚，施放棉衣，使赤贫户勉强度过寒冬。

《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是民国六年（1917）杨柳青辅善社派人绘制的“发大水”情景，并在画的上部用文字记述了1917年杨柳青子牙河以南、南运河两侧地区遭受洪水灾害的情况。

该图珍藏于天津市西青区档案馆珍品库，长约1.2米，高约0.8米。



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

辅善社成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柳青漕运大户石氏族长石元士创议，地方知名士绅等资助捐款，仿照天津市内备济、济生等善社的办法，主办冬舍、义学、恤金，义地、掩骨借纸、施材等慈善组织。其与天津各善社均有联系，遇有杨柳青灾情较大时，由辅善社向各方呼吁募捐，后来“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也每年

汇寄巨款襄助辅善社。

《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图文并茂，其上部文字如下：

民国六年旧历六月初八九日，浑风北运、子牙等河同时暴涨，狂澜巨浪势极汹涌。子牙河南岸决口，洪水滔天灌注杨柳青及赵家场等村，同罹灾害，田庐沦没，身命仅逃，衣资都竭，加之阴雨连绵，栖止无所，触目当即伤心。蒙警察厅长施济苇席、竹弓，搭棚栖宿，稍避风雨。青镇各善士施放玉面、银元，天津水灾急赈会赈济红粮，竭力济饥，稍舒困难。幸经官警人民抢护白滩寺之横道，倍筑截流，青镇赖以未被全灾。何不幸，天灾祸民于旧历八月初五六日，猝被静海县属之独流大桥横壩决口，自西而东。顷刻，白滩寺横道漫溢，东西洪水汇合，且以子牙河水势高逾南运河数尺。俄顷，本镇东街天安水会前、口直门街南运河约三四尺，水势沛然。官警人民合力抢护，莫能抵御，于是南运河南岸平漫，由静至津决口，拾数处重水通汇，灌注南乡天津一带，而杨柳青四水环绕，尽成泽国，田禾浸没，房屋冲倒，损失财力，难计其数。入夜以来，风雨交加，啼饥号寒，哀鸿遍野，荡析离居，惨不忍睹。复经青镇各善士施饼施面施苇席窝铺，又蒙红十字会施红粮棉衣、饼干、药品等物，先后散放，相继赈抚，稍救燃眉之急。所最苦者乡间之民，专依田地讨生活，而被灾最早，禾稼本禾长成柴草，胥遭溃烂，既无炊而无食又无住而无衣，唏嘘流离，莫堪言状，且频沾雨露，偃息于尽。蓬苇席之中，暴烈于冷露秋阳之下，诚徙来未有之奇灾，转瞬霜寒风紧，不死于漂没者，又将死于冻馁。虽蒙各善士之救济，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夫赈救灾黎洵属，当务之急，无如灾区过广，被灾甚重，款项较繁。非以官民一体，群策群力，不足以救全镇灾黎性命，第念霜餐露宿难缓，须臾斗米尺丝悉资，援济多一分之仁浆义粟即可，减一分之啼饥号寒，此境此情当亦为仁人君子所恻然动念者也见在，贫苦无靠之灾民待赈孔急，不得不绘具灾图代为呼吁，务望各界仁人君子诸大善士大发恻隐，解囊资助，尽筹善策，至仁推爱固无获报之心，而衡诸积善余庆之符，必同享幸福祚安康之吉，馨香祝祷俾全镇数千之生灵得以生活，青镇幸甚，灾民幸甚。辅善社谨启。

其文章大致意思是：1917 年农历六月初，由于北运河、子牙河河水暴涨，致使子牙河南堤决口，洪水淹没了杨柳青及赵家场地区。田地和居民房屋被淹，百姓只身逃离，衣服都没有带出来。加上阴雨连绵，百姓没有住处，让人看了甚是凄凉。当地警察厅长为百姓施放竹弓和苇席，让百姓搭建简易窝棚，躲避风雨。镇上的富户、善人施放粮食和钱财，天津急赈会（慈善组织）也发放救济粮，援助杨柳青百姓度过水灾。所幸经过官民齐心协力，筑堤护住了白滩寺横道（后改称和平路，今称青远路），使杨柳青没有被全部淹没。

然而不幸的是，农历八月初，静海县独流大桥横壩决口，洪水自西向东奔涌而来，顷刻间白滩寺横道大水漫溢，东西洪水汇合，冲向杨柳青，且子牙河的水势高于南运河数尺。一时间，杨柳青东街天安水局门前、口直门附近的南运河涨出三四尺，水势很大。虽然官民一起抢护奋战，但是仍不能阻挡洪水。此时南运河南岸的水与河道里面的水高度一致，加上由静海到天津，数处河流、河道因为洪水汇合一处，水势更大，涌向天津和南乡地区。杨柳青

四面被大水包围，田禾都被淹没，房倒屋塌，损失财力，不计其数。每到夜晚，风雨交加，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安身，冻饿呻吟之声，遍地皆是，惨不忍睹。杨柳青镇上的富户、善人等继续施放大饼、白面、苇席窝棚，红十字会又施放粮食、棉衣、饼干、药品，解了燃眉之急。最痛苦的就是靠种地生活的农民，庄稼没了收成，被水淹没都烂在地里，没有柴火取暖、没有可以吃的食品，也没有了住处、为了逃命衣服也都被水冲走了，只能寄居于苇席窝棚中。眼看天气就要转冷，逃过死于洪水，未必能逃过天冷冻死。虽然有各种救济，但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政府提供的赈济款，手续繁杂，一时也难以到位。即使杨柳青官民一致，群策群力，也无法拯救全体灾民。赈济灾民还需要各界一起努力，呼吁各界仁人志士，动恻隐之心，解囊相助杨柳青灾民，渡过难关，这是杨柳青镇的幸事，也是全体灾民的幸事，辅善社代表杨柳青镇全体官民，感谢大家。

《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除了用文字描述 1917 年杨柳青辅善社呼吁天津社会各界对大水灾的灾民予以资助外，其图画也生动形象的描绘出了杨柳青遭遇大水的情况。更为难得的是，图中绘制了民国初年杨柳青的建筑布局、地名位置，是一幅保存完好的杨柳青地理示意图。

图中有不少当时的地名及房舍标注，有白滩寺、津浦铁路火车站、车道房、杜家庄、范家大场、口直门、塔（指的是普亮宝塔）、文昌阁、佛爷庙、东渡口、七星庄、公立学校、张家园、马神庙、中渡口、关帝庙、齐家大场、小刘庄、范店子、冰窖、玉皇庙、郝家嘴、丁家寨、天一水局、后烧锅、姚家村、周家庄、高家柴场、李家园、西渡口、宋家楼后、大场、张家壕、白衣庙、牌坊、药王庙、贫民半日学校、火神庙、辅善社、警察局、万顺当、邮政分局、民辛三学校、施医局、同善社、捐物局、准提庵、蒙养学校、磨盘道。

图中津浦铁路火车站及车道房，正是今天西青道北侧的津沪高速铁路。

白滩寺为杨柳青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子牙河北侧，约形成于清朝光绪年间，最初有韩、马、郑三姓来此定居，因村子牙河畔曾有白塔一座，也成为“白塔寺”，后又因河滩种植桑麻，晾晒之时河滩成为一片白色，也称为“白滩寺”，至今此村依然存在，但是白塔已经无存。

口直门，即口直门大胡同，位于杨柳青东部，形成于北宋景德二年（1005），此处位于南运河河汊北侧，至明永乐十三年（1415）南运河修堤，切断了往镇西北的莲花淀水源，淤塞成陆，两侧逐渐建房，形成胡同居住区。因此地曾为河汊出水口，故名口子门（亦称口直门）。

杜家庄，曾为自然村，形成于元代末年，最初住户姓杜。随着杨柳青逐渐繁华，杜家庄淹没于镇区之内，现如今此村庄位置大致在杨柳青镇清水家园社区之内。

图中有塔，即“普亮宝塔”，位于杨柳青东南部，现位于杨柳青欣杨道北侧。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为纪念杨柳青道士于成功（1725—1803）修建。于成功，道号普亮，自幼习武，研习医学，救死扶伤、分文不收。为纪念其功绩修建普亮宝塔。全塔分为塔基、塔肚、塔身三部分。塔高 12.5 米，南为正面。基座八角形，每边长 1.075 米，束腰式，高 1.03 米。

塔肚为喇嘛塔形，高 1.2 米。塔身高 9.37 米，为七层密檐塔，每层边檐刻有寿字圆瓦。塔肚南面正中有一长方形匾额刻有“普亮宝塔”，右书：大清嘉庆岁次癸亥年，左书：申寅月壬寅日丙午时圆寂。下有一个假门，塔身从第二层起每层设有一个假门，塔后北侧是于成功的墓。

文昌阁，位于今杨柳青镇南运河元宝岛东侧上，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天启二年（1622）被白莲教王浩贤部焚毁，崇祯七年（1634）又依照旧样重建；清咸丰三年（1853）又被焚毁，咸丰八年（1858）再次重建。1941年和 1965 年两次修缮。该阁呈六角形，高 15 米，北为正面。带胎基座，砖石砌成，直径 5.6 米，高 2.3 米，正面出月台，比基座伸出 0.82 米，阶石 12 级，阁身有通天柱 6 根，拼成六角，边角长 2.5 米。计三层，第一层高 3.4 米，木柱外有廊，正面开门木柱间，砌墙有窗，墙外有木栏杆；第二层高 3.2 米，正面为隔扇门，周围有坎墙；第三层高 2.9 米，六面有窗，阁顶宝瓶下为六个龙头，每个龙嘴吞一个脊。顶和每层出檐下有阁铃，二层和三层的砖角拱出象鼻子，总体建筑工程玲巧、精细、壮观，体现古老建筑风貌，造型挺拔俊秀，被誉为杨柳青“三宝”之一，也是杨柳青唯一保存下来历史较长的古建筑，为市级保护单位。

东渡口、西渡口、中渡口，京杭大运河杨柳青段，自西向东蜿蜒穿过镇区，把杨柳青镇南北分割。杨柳青人对京杭大运河杨柳青段简称南运河，旧时杨柳青在南运河上有 4 处渡口，方便镇北和镇南人员往来，分别为东渡口、西渡口、中渡口、小渡口。在《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中没有对小渡口标注，只标注了前三个渡口。西渡口，从清代杨柳青地貌示意图（《津门保甲图说》杨柳青部分）中，可以看出，在旧杨柳青镇奶奶庙（一称“泰山行宫”）向南，直到南运河边，就是西渡口所在位置。东渡口，天齐庙大街向南至南运河边，即为东渡口所在位置。又因南运河水自西向东流动，西为上，东为下。西渡口又称杨柳青上渡，东渡口又称杨柳青下渡。两处渡口都在府县志有明确记载，并记述当时有司渡人在渡口值班，往来摆渡运河南北两岸人员，且有年支经费。在东、西渡口之间，后来又慢慢形成一个私人司渡小船，往来南北接送人，称为“中渡口”。

七星庄，位于杨柳青东部，今杨柳青镇世纪新苑附近宝华街，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为空地，后来陆续迁来袁、郑、赵、李、马、倪、杭七个姓氏的家族来此建房居住，故称七姓庄，后俗称“七星庄”。

张家园，位于杨柳青镇十六街，西起今柳口路，东至原龙王庙胡同，形成于清朝乾隆年间，原为张姓坟地，后人们逐渐在此建房居住，逐渐成巷，并以姓氏得名。

佛爷庙、马神庙、关帝庙、玉皇庙、白衣庙、药王庙、火神庙、准提庵等基本都是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寺庙，后逐渐破败至拆除，但是其周围则形成居住片或者胡同里巷，并以原寺庙名称得名。

小刘庄，道光年间，刘姓在杨柳青镇南部居住，遂得名；周家庄，位于杨柳青西部，十三街界内，相传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取首户周、刘二姓得名周刘庄，后因住户增多，以村中土道为界，分为南北两村，因其在道北，周姓多，故名周家庄；李家园，位于杨柳青镇元宝岛西侧，原为原田，1983 年 7 月杨柳青镇地名普查时定名为李家园，有胡同十余条；郝家

嘴、丁家寨、姚家村、张家壕等地名，均以最早居住此地的居民姓氏和居住地形状或建置形式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镇区扩大发展均已消失。

范店子，形成于咸丰年间，位于杨柳青镇元宝岛西侧，胡同内魏姓住户每年腊月初八施舍粥饭，久之，人们俗称“饭店子胡同”，后传为称“范店子”。

冰窖，清光绪六年（1880）形成，位于杨柳青镇元宝岛西侧，因其附近有戴家冰窖，故称冰窖。

牌坊，原为杨柳青“三宗宝”，牌坊、戏楼、文昌阁。位于杨柳青镇南运河北侧岸边，药王庙东大街南口，今已无。

天一水局，位于杨柳青中部，形成于清朝嘉庆年间，为旧时救火的消防组织。

磨盘道，位于杨柳青镇西部，原河沿大街北侧，形成于清朝乾隆年间，其地理位置是旧时杨柳青居民挑水之处，其道路为了挑水方便，用废旧磨盘砌墁，形成磨盘道。

齐家大场、范家大场、大场等地也均是旧时人们晾晒粮食的空场，后随镇区繁荣发展，场地占用，逐渐消失。

辅善社、同善社、施医局、捐物局为当时杨柳青镇的乡贤士绅筹建慈善机构，警察局、万顺当及部分标注的学校均为当时一些职能机构，图中标注也就以其名称代为地名。

这些地名标注出来，可以使我们对 1917 年杨柳青镇的布局、道路、房舍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对于研究杨柳青民国时期的居民生活有参考价值，对于镇区历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西青区档案馆）

（上接第 35 页）

真编写、不及时报送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追究相关当事人和责任人的责任。打造区级“精品年鉴”，不能忽视区直部门和单位以及镇街基础年鉴材料编写和及时报送工作，要下大力量抓好这项基础性工作，为区级年鉴编纂提供翔实、生动、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打造区级“精品年鉴”才会有丰富、鲜活、优质的实质性内容作支撑。

五、弘扬年鉴文化

推进区级“精品年鉴”创建，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年鉴文化”的有力抓手，也是基本载体。要把打造区级“精品年鉴”与弘扬年鉴文化密切结合起来，放大年鉴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和感染力，让更多的受众及时读到精心编纂的年鉴，从中深入了解区情，感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脉络、成绩、亮点以及成功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等，增强对年鉴文化的认知，使年鉴文化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精心编纂区级年鉴，固然重要，但是做好区级年鉴的推介、发行、宣传工作同样重要。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借助多种平台，通过多种途径，把新出版的年鉴介绍给广大受众，吸引各界人士关注年鉴、品读年鉴、知晓年鉴，在阅读年鉴中获得知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受到激励和启发，使“精品年鉴”的作用有效发挥，进而使年鉴文化发扬光大，让“精品年鉴”工程实施连同弘扬年鉴文化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作者单位：宝坻区档案馆）

“安福财神”王郅隆其人其事

王庆普

一、一块石碑引发对“安福财神”王郅隆其人其事的探究

去年笔者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物流加工区高新纺织工业园的天津纺织博物馆参观，发现院内陈列着一座《故总理王公祝三纪念碑》。仔细阅读碑文，得知“王公祝三”是裕元纱厂创始人王郅隆。他竟然是我的同乡，一下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现陈列在天津纺织博物馆院内的王郅隆纪念碑

纪念碑高 250 厘米、宽 92 厘米、厚 31 厘米，重量估计要超过 2 吨。由于年代久远，石碑已从中间断裂，还能看出粘合的痕迹，碑体颜色深浅不一，但字迹比较清晰。可惜缺失了常见的底座和碑帽。

碑体上方正中刻有“故总理王公祝三纪念碑”10 个大字。左下角落款：“杭县”朱是撰文，“铜山”张伯英书写，“北京琉璃厂”李月庭刻石。碑体近 800 字的楷体碑文中记述了棉纺二厂的前身——裕元纱厂创建和治理的过程。立碑日是 1924 年 9 月 1 日，即王郅隆逝世周年日。

后来在查阅档案资料时发现，1924 年 9 月 2 日《大公报》上有一篇《裕元公司公祭故总理》的文章，报道了前一天裕元纱厂为王郅隆举行公祭大会的情况，全文刊登了演说词。还发现一张“锺纺公大小学校（棉纺二厂职工小学前身）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八日首届毕业师生合影”的老照片，就是以纪念碑亭为背景拍摄的，证明了纪念碑亭确实存在。

锺纺公大小学校师生以王郅隆纪念碑亭为背景的照片

这块近百年的石碑，对于研究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史和天津纺织发展史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作为石碑主人公王郅隆的同乡，笔者对这位“安福财神”的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

二、善经商，白手起家，成为天津著名商人

王郅隆，1868 年出生于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苑庄子村。1923 年卒于日本横滨。据村里老人介绍，苑庄子村位于海河中游南岸，旧时村民多靠河为生。王郅隆的父亲王鸣礼是靠在海河上撑船挣钱来养活妻子和五个儿子。王郅隆排行老三，取字祝三。因为家境并不富裕，王郅隆和五弟王蕴隆很小随着邻里乡亲来到东北谋生。他从粮店学徒干起，后来当上外柜负责兜揽粮食生意。经过长期观察，老板看他是块做买卖的料，就让他当了店掌柜。王郅隆混迹粮行多年，行业人脉极广。后来靠着极广的人脉做起了粮业、木商卖家和买家之间牵线搭桥的生意。

王郅隆照片

王郅隆是想干大事的人，攒了些本钱之后，他干起了自己的买卖，在河北唐山开了家杂货铺，取名“义发祥”，经营零售兼批发。后来他发现天津海河与东北之间的船运非常方便，天津市区人口密集，需要大量木材，于是利用自己在东北木材方面的人脉资源，在天津城里开了家木行——元庆木号。木行成立不久，恰好赶上天主教堂兴建，那里的负责人又是自己的老熟识，这笔木材生意让王郅隆赚了一大笔钱。王郅隆又陆续开设米庄、涉足天津盐务，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天津粮业、木业和盐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天津商会重要人物。

三、巧钻营，结识倪嗣冲，成为皖系亲信

在王郅隆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倪嗣冲这位“亲密挚友”使他搭上了快速发展的“顺风船”。

倪嗣冲（1868—1924），安徽阜阳人，皖系军阀。因为一直追随袁世凯左右，深得器重。1901 年 11 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倪嗣冲跟随袁来到天津，担任北洋营务处统领。后经袁举荐成为黑龙江省藩台。后因故被参革职，倪嗣冲又回到天津。

有钱后的王郅隆经常出入赌场，是当时有名的赌坛“圣手”。但他赌钱不以赢钱为目的，而是作为结交权贵的手段。他经常将赢来的钱如数还给输家，在赌场颇有人缘。一次王致隆去天津南市天宝班打牌，赢了倪嗣冲两千多两银子。这些银子是从军饷挪用来的，这可是杀头之罪，急得倪嗣冲直冒虚汗。见状，王郅隆借故急需离开，就将手中的全部筹码一股脑都推给了倪嗣冲，等于救了他一命。从此，两人结为亲密挚友。

1911 年武昌起义后，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倪嗣冲重返政治舞台，被委任为武卫军右翼统领、河南布政使。1914 年 6 月 30 日，倪又被任命为安徽省督军，授安武将军。倪嗣冲为报王郅隆往日之恩，任命其为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因此借力皖系军阀把自己的商业才华发挥到了极致。

军阀混战时代，能从财政部按期如数领出军饷，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身为后路局总办的

王郅隆深谙此道，凭着颇广的人脉和过人的手段，总能如愿。他用军饷做周转金，先做投机生意，再连本带利奉还安武军。王郅隆还精心掌管倪嗣冲在安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替倪嗣冲购买黄金，然后如数交还。因此，深得倪嗣冲信赖。政治上的结合，促成了他们在经济上的长期合作。王致隆与倪嗣冲、段芝贵等人先后合资在安徽、河南等地经营盐务，在津组建长顺盐业公司，在河北井陉组建正丰煤矿公司。

王郅隆的经营才能得到皖系军阀徐树铮赏识，任命王为安徽、湖北和黑龙江等省盐务榷运局总办。这让王郅隆更是如鱼得水，他利用皖系的权势发了大财。1902 年先是参股，1916 年全面接手天津《大公报》，使该报成为皖系喉舌。1910 年，王郅隆入股天津华昌火柴公司，该公司规模居全国同行之首，资本 25 万元，职工千余人，王郅隆任董事。1918 年该公司重组为天津丹华火柴公司，资金总额达到 200 万元，王郅隆仍担任董事。

四、审时势，兴办实业，成为军阀身边红人

根据《故总理王公祝三纪念碑》记述的内容，可以了解王郅隆创办裕元纱厂（天津市棉纺二厂前身）的过程。民国初年，王郅隆洞悉兴办实业恰逢其时，在考察市场之后，前往上海向“棉纱大王”荣宗敬（申新纱厂老板）取经，随后决定筹建裕亨纱厂，但因故未能开工。王郅隆不死心，他说服一些时局要人投资建厂。1916 年购地 262 亩建成了裕元纱厂。选址在海河边的小刘庄，便于企业用水、运输。王郅隆担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阵容之强大震惊全国纺织业，段祺瑞、倪嗣冲、吴鼎昌、周作民、陆宗舆等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佬组成了董事会。年底正式注册为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额 200 万元，纱锭、织机全部从国外进口。王郅隆的开源农场供应纱厂原材料。1923 年，经日商大仓洋行入股后，资本额达到 556 万元。在天津六大纱厂中，裕元资本最为雄厚、投资时间最早、产纱规模最大。正是裕元纱厂的投资筹办，带动了华新、宝成、裕大等天津纱厂的相继建立。

在经商办企业的过程中，王致隆有了创办金融机构的想法，既能吸引闲散资金为己所用，还能够以钱生钱，赚取可观的利润。1917 年初创办了裕庆公银号，他与倪嗣冲是股东。后来他又找好友周作民（时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行长）商议，开办一家真正的私营银行。拉上倪嗣冲、徐树铮、吴鼎昌、陈国栋、曲卓新、段永彬、任凤苞等军阀、财阀组成董事会。1917 年 5 月 15 日，在法租界七号路 43 号成立金城银行，先后又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行，是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王致隆为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由于银行众多股东非官即商，再加上王郅隆、周作民的精心打理，金城银行存款额曾雄踞全国商业银行之首。王郅隆的身家也达到了 450 多万银元。

五、搞攀附，效忠安福系，成为安福财神

1916 年 6 月袁世凯去世。1917 年 7 月，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为达到排斥异己，控制国会的目的，段祺瑞指使徐树铮于 1918 年 3 月 8 日成立以皖系军阀政客为主体的安福俱乐部（因地址位于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其成员被称为“安福系”。该系作为皖系军阀左右北方政局的政治力量在政界颇为活跃。在 1918 年 8 月新国会选举中，安福系以非法手段操纵选举。在全部议员的 400 多人中，安福系占了 380 余人，因而这届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

在徐树铮、倪嗣冲的安排下，王致隆当上

了俱乐部常务干事、会计课主任，成为安福系财经掌管人，并在新国会选举中当选参议院议员。倪嗣冲曾向段祺瑞力荐王郅隆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但因安福系内部意见不统一，没能成功。

走马上任的王郅隆为安福俱乐部倾情效力。1919 年，他打着北洋政府参战处的旗号建起了荣庆米行，从江南低价收购大米，再高价卖给日本，获取巨额暴利。同年 9 月与北洋政府秘书长徐树铮在内蒙古库伦创办了边业银行，与公兴存和谦益两个大米庄集资 40 万元在河北赵家场购地建立了裕兴面粉公司。他自己又在天津开办了义生源米庄。到 1920 年，王郅隆为安福系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俱乐部资产达到四五百万银元。因此，王郅隆被安福系成员称为“财神”。

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1920 年 7 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直系军阀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王郅隆作为“安福十大祸首”之一也被通缉。王郅隆到北京日本兵营避难后偷偷回津。20 年代初棉纱行情看跌，棉布大受欢迎。躲过风头的王郅隆计划为纱厂增添织布设备。1923 年春天启程前往日本，准备向合作伙伴大仓洋行借款 300 万银元。同时也是受段祺瑞委托，为皖系东山再起筹款。到日本后，王郅隆与大仓洋行谈判，又向日本其他财团商谈借款，耽搁了几个月。9 月 1 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 7.9 级强烈地震，王郅隆不幸遇难身亡，死于横滨。在王郅隆追悼会上，在津安福系要人悲痛欲绝，他们送的挽联最多，感慨王郅隆的逝世意味着安福系的失败是天意。徐树铮的挽联：“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道出了安福系的心声。王郅隆的亲密挚友倪嗣冲闻听噩耗悲痛欲绝，病情加重，于转年去世。王郅隆遇难后，倪嗣冲长子倪幼丹接替了裕元纱厂总经理一职。此后，裕元纱厂因经营不善被日商大仓洋行吞并，1936 年又转卖日商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

七、斯人已去，旧物尚存

王郅隆在天津市区和北戴河有三处宅邸。

一处位于河西区浦口道 22 号。1900 年建成，为德国花园式风格，是王郅隆的正夫人及长子王景杭住宅，现为天津市物产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占地面积约 5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米，砖木结构二层、局部三层楼房，设有地下室。庭院花草树木环绕。

王郅隆位于浦口道 22 号的住宅

院门右侧是一个门房，为德式牛舌瓦尖顶小二层建筑。院内大水池用雕花汉白玉石柱围绕，中间是一个中国古典式的六角尖顶亭，一座汉白玉石桥与六角亭相连。沿十六级的高台阶，便来到宅邸正门口，门前四根大理石柱支起一个三面折角门廊。进入正门便是一层大厅，四周分布着客厅、书房、餐厅、厨房等房间；二层有大厅、卧室等房间，走到尽头来到门廊上方，是一个三面折角大平台；三层为阁楼。半地下室有两个出口。楼房所有窗户都是双层玻璃中间夹纱窗。

王郅隆第二处宅邸

王郅隆在天津的第二处宅邸位于天津意租界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道 74 号），是其如夫人和其子王松午的住宅。现为天津电力行业协会办公地点。

这处宅邸为二层红砖小楼，设有地下室。前立面全部为廊柱结构，入口设半圆形回廊，顶部有半球形穹顶。该楼后有一座样式相似的楼，两楼之间有走廊相连。

王郅隆还有一幢别墅，位于北戴河海滨西经路 56 号，主要用于家人度假和好友聚会联谊。

王郅隆在北戴河的别墅

王郅隆在老家苑庄子村（津南区咸水沽镇）建起了王氏家祠，后被村民称“王祝三祠堂”。祠堂占地面积约 5 亩，祠堂有曹锟所题牌匾。祠堂是非常气派的四合院，分东、西两院，有正殿和偏殿。平津战役时，解放军曾将祠堂作为营房和伤员休养之所。1970 年以后，在祠堂中开办企业。2009 年修建天津大道时，在祠堂旧址出土残碑一通，铭文为《王氏家祠记》，刻于 1916 年。碑文正反两面有字。正面上方以大号“以”字贯顶，反面上方有大号“德”字贯顶。这块石碑记录了王祝三生前在津南苑庄子营建祠堂以及王氏家族变迁的情况，后人所立碑以记之。出土后保护不当，残损严重，多处受损缺字，碑体断裂成三截。

民国“王氏家祠记”汉白玉碑

紧挨祠堂西面，王郅隆为本村子弟建起一座学堂。学堂占地 1000 平方米。 教室房前有避雨走廊，共计 5 间教室，东边 2 个教室，北边 2 个，西边 1 个，南边 1 个办公室，院为青砖铺成的天井。学堂有教师 7 名，招收本村适龄儿童入学，学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校方担负，包括春秋、夏、冬三套校服。学堂采用新式教学，学制六年，以语、算基础课为主。到 20 世纪 40 年代，生源减少，王氏学堂只剩教师 2 人，学生 20 余人。新中国成立后，该学堂被收编为公办学校。随着 2009 年天津大道修建，以及 2011 年咸水沽镇示范小城镇建设，苑庄子村先后实施了两次拆迁，王氏祠堂、王氏学堂和村庄一起都已不复存在了。

（作者单位：津南区政协）

顽强斗争的盘山民兵班

王玉梅

1945 年日本投降，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侵略战争。就在这年的 5 月 26 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分区在平谷刘家河召开抗日群英表彰大会，盘山民兵班被授予“民兵英雄”的称号。这个民兵班为何获得如此殊荣？他们到底是怎样英勇顽强的进行抗日斗争？让我们走近他们，一起感受战争的浓浓烟火。

悠悠蓟水，巍巍盘山。1938 年，抗日烈火在渔阳大地熊熊燃烧。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武装大暴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军为了扑灭这股烈火，开始推行“治安肃正”运动。他们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一次比一次疯狂，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短短时间竟制造了 60 余起惨案。

1939 年，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决定以盘山、鲁家峪（遵化）等地区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包森率 200 多名武装人员挺进盘山，许多民兵加入队伍。为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和扩大盘山抗日根据地，上级党委决定建立以盘山为中心的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着手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他们首先把盘山周围 20 多个居民点的 80 多户人家，统一划为一个行政村，名为联合村，建立村政权，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当了民兵。盘山民兵班就是从这个时候逐步形成的。这些民兵，平时生产，有了敌情就保护群众，打击敌人。8 月，盘山民兵诱敌入山，配合主力军部队在白草洼消灭了日军 70 余人，群众拍手称快，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随着蓟县盘山根据地发展壮大，盘山民兵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日军不断集结兵力围剿扫荡，推行“三光”政策，连续制造大屠杀惨案，造成大片“无人区”，妄图断绝抗日军民的生活来源。在此基础上，日本特务柿岛在蓟县专门成立了一个 30 多人的“清乡突击队”，到全县各个角落去清乡扫荡，强迫每个村交出 5 个八路，交出八路军的一切东西，供出抗属和“秘密小组”。群众说没有，当即镇压杀人。同时，驻扎在各据点的日伪军也是三天一清乡，五天一扫荡，其惨无人道的行为达到了极点。“抬头见岗楼，迈步是壕沟，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英勇的盘山民兵没有被日军的淫威所吓倒，而是擦干血泪继续投入战斗，帮助八路军送情报，救护、掩护伤员，掩藏物资，与八路军一道共御敌寇。

1941 年 6 月，日军调集大批兵力疯狂“扫荡”盘山，企图将盘山也划为“无人区”。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冀东党分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将冀东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转移到长城以北，相机扩大热南游击区。盘山根据地则由民兵武装坚持斗争。当时以丁福顺为首，杨宝森、于连海、崔良义、崔寿山、伍德发、王志、史秀、史佐、史广德 10 位民兵战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守在盘山，继续与敌人周旋。

丁福顺，原名崔良德，出生于盘山脚下的

联合村，1939 年从事抗日活动，1940 年 2 月，当选为联合村财粮委员。7 月，日本特务队长山本到联合村扫荡，抓住了丁福顺的大哥，逼问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此时丁福顺正和民兵们在石佛山一带打游击，得知消息后，他们一阵枪鸣。日伪军听到枪声惊恐万状，气急败坏架起火，将丁福顺大哥残忍烧死后逃跑。目睹亲人们被杀害，民兵们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他们学会了制造炸药，埋设地雷。每逢日伪军进山清剿，丁福顺都带领民兵在日伪经过的道路上埋设地雷伏击。

1940 年 6 月 18 日夜，十三团政治处主任洪涛率领十余名战士转移至该村，日军得到消息后，当夜奔袭包围了联合村，民兵王忠在生死关头，向敌人扔出了仅有的两颗手榴弹。被爆炸声惊醒的群众，在战士和民兵的掩护下向北转移，而王忠却倒在血泊之中。王忠的妻子被敌人抓住，她捡起石块猛砸敌人，敌人把她和其他没来得及转移的 15 名群众捆在大树上，连夜拷打审问，追查八路军的去处，他们宁死不说，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残暴地将浇在他们身上的汽油点燃，活活烧死了他们。

民兵们没有被腥风血雨吓倒，他们发誓“宁死不下山，与盘山共存亡”。他们每人手持一杆枪，利用石洞峭壁，和敌人周旋，利用熟悉的地形、地势，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埋地雷、炸碉堡，护粮，屡建奇功。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多次“进剿”均失败。11 月，冀东专署公安科长叶田和平密兴联合县委书记李子光一起来到盘山，见到丁福顺等十几个民兵，没想到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盘山还有民兵在坚持抗日。于是，把丁福顺带领的这十几名民兵命名为盘山民兵班，丁福顺任班长，杨宝森任副班长。

民兵班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就以地里的白薯秧子、野菜充饥。1942 年冬天，正值寒冬腊月，日伪军趁大雪连续搜山，妄图将盘山民兵一网打尽。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民兵战士们来不及准备，只穿了单薄的衣裳，每人带着 3 斤炒米和几块冻冰，攀峰越沟，转移到联合村东北大山中的冰凉洞内。几天过去了，敌人仍在搜山，民兵的炒米吃完了，只好啃冰块充饥。丁福顺将自己随身带的旱烟拿出来，分给大家你抽一口，我抽一口，既为解饿取暖又为打发难捱的时光。最小的民兵战士王志还是个孩子，怕冻死、饿死在这里，担心地哭起来。大家纷纷劝解安慰，互相鼓励：不怕，咱们待不了几天，一定要活着出去！并一起发誓：即使饿死、冻死，谁也不许当叛徒投降！

鬼子见山上没有动静，在山下用大喇叭朝山上喊：“民兵弟兄们，八路军已经跑了，你们跟他们干是没有前途的，下山吧，让你们住城里去，吃香的喝辣的，有屋住，有钱花，还可以挎洋枪……”民兵们没有一个被他们的诱惑所动摇，反而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在冰冷的山洞里，坚持了 7 天 7 夜，直到大雪融化。在第七天夜里，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山，没有休息，就把敌人从官庄到彩各庄五六里地的电线杆，一鼓作气全部砍倒。

1943 年春，为配合主力部队恢复基本区战役，他们锄奸反特、破坏交通线、埋地雷炸敌人。在北后子峪村，他们化装进入村中，活捉了汉奸幺宾，当众宣布罪行，予以处决。1944 年春，蓟县西关的伪二大乡计划麦收后到盘山抢粮，丁福顺带领盘山民兵越墙进入西关大庙，砸了乡公所，活捉伪副乡长，烧了敌人征收小麦的全部账册；在瀑水村附近，民兵班与特务队长山本率领的特务队遭遇，班长丁福顺指挥民兵围歼敌人，山本当场毙命。民兵班趁盘山

脚下田家峪据点的敌人集中操练时，开枪射击，往井里扔狗粪、撒红土。操练的敌人一阵慌乱，躲进据点不敢出来。而后发现井里的浑水，怀疑下了毒不敢喝，于是组织伪军外出弄水，民兵趁此伏击，让他们不得安宁。最终，日军不得不撤掉了田家峪据点。

当我军主力部队返回盘山，盘山民兵班已发展到 46 人。8 月，丁福顺奉上级指示，带领盘山民兵围困彩各庄据点。丁福顺布置部分民兵在街口、村头警戒，自带盘山民兵班进入街里。突然，炮楼顶上出现一个穿白衬衫的敌人探头张望，杨宝森一枪将他打掉。与此同时，炮楼里的机枪开始向外狂扫猛射。民兵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围而不攻。第二天，县城的敌人前来接应，民兵撤到了西后子峪，继续监视敌人动向。敌人感到情况不妙，将军火、物资装满三大车，欲往县城方向逃窜。丁福顺下令追击，并和王志率先冲上前去。敌人一边逃窜，一边机枪扫射阻止。丁福顺被压制在一个土坎下，关键时刻，王志奋勇上前，冲到据点的楼顶，以高处的优势击毙了敌人机枪射手。敌人害怕被全部歼灭，仓皇丢下两辆装载军火物资的大车，狼狈地逃走了。

唐代诗人杜甫曾在《后出寨》五首的第四首中写到“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道出了蓟人自古就具有英勇豪侠的性格。如今，我们追溯历史，重温红色故事，走进抗日战争，走进那些为了民族尊严，为了人民安危，不惜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感受他们身怀大义的爱国爱乡的激情，激发我们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以告慰先烈忠魂，为蓟州更美好的明天奋发努力！

（作者单位：蓟州区文化馆）

市方志办业务人员赴东丽区方志办作辅导讲座

3 月 3 日上午，应东丽区档案馆（区方志办）邀请，市档案馆（市方志办）派方志指导部三级调研员沙洵和年鉴指导部副主任余辉、四级调研员曹健赴东丽区作辅导讲座。此次辅导讲座是东丽区 2021 年档案与地方志工作培训视频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区档案局局长张俊河，区档案馆馆长张玉明，区档案馆副馆长、区方志办主任安战及全区各单位分管档案地方志工作同志、科室负责人及档案地方志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沙洵同志以“乡镇志编修的基本知识”为题，从乡镇志的发展历程、特点、编修流程、体例、篇目设计、组织管理等方面，系统地讲解了乡镇志书的编修工作，为各街道完成街道志编修出版任务做好理论指导。余辉同志以“严格规范 注重创新 努力提升《东丽年鉴》编纂质量”为题，从年鉴照片选取、大事记、条目撰写等方面为全区年鉴参编单位做了详细的讲解和专业指导，并结合《东丽年鉴》实际情况提出指导性建议。曹健同志对《东丽年鉴（2021）》编纂工作进度进行了督促指导。

东丽区方志办对此次辅导讲座给予高度肯定，会后将培训提纲印发相关单位供学习参考。参训人员一致认为，此次讲座重点突出、系统全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指明了下一步工作方向和工作要求。市方志办通过深入基层开展辅导讲座，提升了基层人员修志编鉴的业务水平，为推进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打下坚实的基础。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出版发行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和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共同编著的《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由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是第二轮《天津市志》的一部重要分志，上限始于1840年，下限至2012年，全书纵贯170余载，地域横跨四省一市，设10章48节，篇幅长达225万余字，是我国首部将航标、测绘、通信三大专业融为一体的专业地方志书。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是交通运输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北纬35度线以北海事航标建设养护、港口航道测量绘图和水上安全通信等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工作。中心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文化铸魂”作为中心7项发展策略之一。中心从2014年起启动了《北海航海保障志》编纂工作，并将其作为航海保障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志书的编纂经234名同志参与，收集史料1900余份，编写大纲反复调整10余版次，历时5年，终于2019年完成初稿，并于同年10月29日通过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复审，于2020年底交付印刷。

该志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陈述了北海航海保障事业由弱变强、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客观反映了近现代航海保障技术从引进应用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文化品格，全面展示了历代北海航海保障工作者“燃烧自己、照亮航程”的精神境界。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该志书的面世为我国航海保障事业创新发展发挥重要的资鉴作用。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天津市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1991—2013）》出版发行

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编著的《天津市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1991—2013）》正式出版发行。

本志是列入市政府第二轮《天津市志》规划的一部重要分志，也是《天津市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1949—1990）》的续志。该志记述内容起于1991年，讫于2013年。全书共130余万字，采用篇、章、节、目体结构，横分门类，纵述历史；以志体为主，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全面、客观反映天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22年来的发展历程。

天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1991年以来，坚持改革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逐步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转变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家庭幸福，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把这些历史经验记载下来，对科学制定天津未来人口发展战略，落实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实现天津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和平年鉴（2020）》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的《和平年鉴（2020）》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该卷年鉴设图片、综述、特载、专文、大事记、工作纪要、统计资料、光荣榜、附录等类目，下设19个分目，966个条目，收录243幅图片，18张表格，全书约40万字。卷首专题图片设天津市和平区地图、我和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商贸、宣传监督、新时代文明、军事政法、安全防范、义务教育、文化交流、体育赛事、廉洁初心、社区生活、美丽和平，卷末附和平区社区居委会一览表、和平区幼儿园一览表、和平区小学一览表、和平区中学一览表、和平区区域内医疗机构、和平区大型餐饮业一览表、和平区星级商务楼宇等级、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选介、和平区旅游景点简介。该卷年鉴图文并茂、设计精美、庄重典雅，框架设计全面合理、分类科学、层次清楚，内容翔实，资料系统连贯，文字精练、语言规范，年度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为社会各界了解和平、认识和平、研究和平提供了一部百科全书，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和平区档案馆）

津南区档案馆组织学习《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津南年鉴》编纂工作，确保编纂出版质量，津南区档案馆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组织地方志编修人员集中学习《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

会议全文学习了《补充规定》，并重点解读了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等规定。通过学习研讨，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补充规定》为年鉴编纂出版工作提供了法规依据，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推动年鉴编纂出版的发展和进步。

会议要求全区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补充规定》，并对《津南年鉴（2021）》供稿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各单位稿件须按照年鉴体例分条目报送，综合条目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主要成效、年度特点、存在问题等；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基本要素齐全。二是年鉴应注重记述本单位（部门）主要职能工作，一般不记述内设机构、领导职数、人员编制，不记述部门机关党建、宣传信息、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非主要职能信息。三是严格审查稿件内容，供稿时不得报送涉密内容。四是年鉴编纂工作要以服务经济发展和地方特色为宗旨，《津南年鉴（2021）》在卷首专题图片及篇目中编入了本区“五个一”重点工作。

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按照《补充规定》要求，严把稿件政治关、业务关，从源头上规范编纂工作，提升编纂质量，按市方志办规定的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津南年鉴（2021）》出版发行工作。

（津南区档案馆）

武清区召开 2021 年方志年鉴工作培训班

为提高《天津市武清年鉴（2021）》的编纂质量，进一步扩大武清镇（街）志、村（居）志、行业志的编修范围，3 月 18 日，武清区以区委办名义在区行政中心组织召开了 2021 年武清区方志年鉴工作培训班。区委办负责领导、区档案馆（区方志办）方志年鉴科工作人员及 100 余家供稿单位的 100 余位撰稿人员参加培训。

区委办三级调研员常跃峰做开班动员讲话，对 2020 年武清区方志年鉴工作做简要总结，并明确了此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对与会者提出“四好”学习要求。

方志年鉴科负责同志做业务培训，围绕历年武清年鉴供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总结和讲解，对年鉴撰写知识和供稿规范进行讲解，对 2021 年武清年鉴供稿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传达中指组、市方志办关于志书编修、名镇名村志编修工作的精神，明确编修流程和编修规范。下一步，武清区档案馆（区方志办）将认真依照市方志办的指导和部署，深入落实年鉴方志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努力提升武清年鉴质量，加快扩大武清镇村志编修范围，为武清年鉴入选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武清志书进入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努力开拓进取。

（武清区方志办）

宝坻区档案馆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特色活动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促进党史学习教育，宝坻区档案馆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特色主题活动。

一是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区档案馆以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为契机，面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征集党史资料特别是中共宝坻地方史料，挖掘红色资源，丰富红色档案资料馆藏和利用。3 月上旬，为促进征集工作有效开展，宝坻区档案馆党员干部和专业人员深入林亭口、八门城等镇进行调研摸底，了解相关情况，区融媒体对此项工作予以关注，并做采访报道。

二是举办“党的光辉润宝地”主题展览。充分发挥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优势和工作特色，将馆藏的反映宝坻地方党史的红色图文资料制作成展牌，举办以“党的光辉润宝地”为主题的展览，反映宝坻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启发和激励社区居民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建设“枢纽之区、科创之区、生态之区、幸福之区”贡献智慧和力量。主题展览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在馆内举行展览，吸引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观，还将展牌带到共驻共建社区以及帮扶村和区中心文化广场等处进行展览，并将展览活动与宝坻区委倡导的“党群连心·情暖宝地”主题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主题展览内涵，满怀深情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宝坻区档案馆）